



中國軍人偉大

楊昌溪著

金錫書齋



中華書局
郵政特准掛號
零售每冊五分

MONUMENT

著者謹以本書紀念王濬之女士，她對本書的撰著會給與不少的意見。在南京退居之前，在難民擁擠的船上，在恐慌的武漢，她都親見著者听夕的研討和深思；可惜著者剛回到別來十年的塗山字水時，她竟在漢口的轟炸中因救亡工作而死；直到本書的出版，已是她的月忌了。爲了補償她一生掙扎奮鬥而未遂的心願，著者克制着內心的隱痛來完成這本書；願在抗戰勝利，痛飲黃龍之日，她會在靈魂中，爲祖國的自由欣然高歌。

昌溪誌念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夜，
時正我軍反攻南京。

MB
E296.0
40.

中國軍人偉大

楊昌溪著

1938

上海

金湯書店版



3 2285 2684 8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單行本

- 西鍊歸來（譯）
- 無緣的猶太人（譯）
- 雷馬克評傳（編譯）
- 黑人文學之鳥瞰（編譯）
- 卓別林之一生（編譯）
- 精神國防與國民總動員（著）
- 德意法西斯與文學（編譯）
- 世界各國的勞動與服務（編譯）
- 蘇俄戲劇的演進歷程（編譯）
- 戰爭文學與非戰文學（譯著）
- 世界電影檢查及其國策（譯）
- 日本人眼中的百年後人種戰（譯述）
- 誰是今日中國之領袖（著）

自序

著者不是軍人，但常在軍中，一生同軍人接觸的機會很多，故敢冒險來作這種他人未做過的嘗試。

我四年前在江西便有試作本書的企圖，但外力的刺激並不多，也只零星的寫了一點來發表。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發生，這一次嚴陣而英勇的應戰，把中國鑄成了一個碩大的巨人，昂然的直立起來。由於英勇戰士的犧牲和奮鬥精神的感召，我決心來完成本書。——尤其是我讀了俄國人郭泰納夫論中國軍人的書，使我堅定了迅速完成的決心；既然一個外國人能作他的觀察，身為中國智識份子的我，更應負起這道責任。

著者此書只是一種嘗試，本着「嘗試成功自古無」的話，本書也許是失敗了的。不過著者敢以虔誠的意思想求各方直接惠函來指正。如果指示的是正確，無有不在再版時改正的。（惠示請暫由重慶商業場今日出版合作社轉）而且作者還想做繼續的研究，如果讀者願意作詳細的討論，或供給以實際材料及遺聞軼事，一經錄用，著者願以本書為酬。

再本 來 預備刊登一些此次抗戰實現的珍貴照片，可是因為銅版紙缺乏，只得以後再添。同時還作附錄的各種改革軍隊文字，也因篇幅限制刪去。然而著者總願有一日能將上述的二項辦到，至少是抗戰發生後一種難得的文獻。

臨末，對本書出版，在精神助力上應予以感謝的是巨良先生和文煥兄，而行麟兄擬擇一部份譯成英文，由其美籍夫人交美國雜誌發表，如果使美國人能加增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而給世界文化的毀滅者以打擊，那應致感激之忱的不止著者一人了。

楊昌溪

二十七年二月五日，時
正敵機襲宜之次日。

中國軍人偉大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一)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二) 中國先賢的戰爭觀

(三) 中國軍事學家的戰爭觀

(三) 中國戰爭思想給與日本之影響

第二章 中國軍人的特質與精神

(一) 中國軍人的偉大



(南)

(二) 中國軍人與孔子思想

(三) 中國軍人與英雄崇拜

第三章 徵兵與兵的素質之改造

(一) 中國歷代的兵役制

(二) 軍訓與徵兵制的實施

(三) 軍訓與兵役

第四章 抗戰與中國軍人素質之攪變

(一) 過去中國兵的素質之腐敗

(二) 太平軍與中國兵素質之改變

(三) 國難與中國素質之攪變

第五章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一)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二) 軍人抗戰精神的偉大支持者

(三) 戰鬥性與地理環境的影響

(A) 北方的尚武與豪俠

(B) 南方軍人的戰鬥力

(C) 飲食給與南北軍人的影響

(D) 北方移民對於南方民族的影響

(四) 黃埔精神與廬山精神

(五) 中國軍人之進步

第六章 中國空軍的戰績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二) 飛將軍的戰鬥力與抗戰情緒

(三) 中國空軍的將來

(A) 技術的訓練問題

(B) 政治的訓練問題

第七章 中國軍人的改造及其將來

(一) 外患與軍備的改進

(二) 外人眼中的中國現代軍人

(三) 抗戰中的游擊戰術

(四) 全面抗戰中的兵士與統帶

(五) 全面抗戰與中國兵士之將來

- (A) 抗戰後的兵士與民衆
- (B) 外人論抗戰受挫的原因
- (C) 中國兵士之將來

第一章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一) 中國先賢的戰爭觀

(二) 中國軍事學家的戰爭觀

(三) 中國戰爭思想給與日本之影響

第一章 中國人戰爭思想之檢討

(一) 中國先賢的戰爭觀

論到軍事，如果要在中國先賢的遺教中覓出一種確切的根據，一定是會使人失望的。因爲在先賢中，無疑的可作代表的是儒家，而儒家的王道思想便是寄託遠肇于堯，舜，禹，湯，文，武，的所謂王道思想。由所謂王道思想的繼承，孔孟一生所做的都是「祖述堯舜，顯彰文武」的工作。

孔子喜言「仁」，孟子喜言「仁義」；因此，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主張，便是「德治」與「禮治」。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即是說：爲政者不在「武力」，有了「德」，人民擁護的情狀，正如衆星之拱比。繼承孔子思想的孟子，他更明白地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因此，孔子在答弟子詢問治國的主旨時，認定在「足食足兵」兩要素之下，不得已而「去時」

，主張又是以「去兵」爲先。孟子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又認爲善爲陣善爲戰者是大罪，而是不以爭城奪地，開草萊，殺人盈野爲功高。孔孟的這種主張，即是所謂「王道思想」的表現，雖然並不曾否認弔民伐罪的「仁者之師」的義舉，但已給與後世政治上以非戰的暗示，泥古的人們常是執一以概其餘。再益以儒家的思想數千年來素常被統治者卸用作「帝王之術」，此種非戰的暗示自然深澈的影響到了政治上；從而士風萎靡，志氣消沉，不僅外侮不能抵禦，就是內亂也常感着缺乏鎮壓的能力。

老子主張「無爲而治」，根本上連孔孟的仁義和法家的法治也認爲是糞土。他生當春秋之際，諸侯互相兼併，戰亂不休，所以更進一步而嚴厲的倡導非戰之論。他認定是：「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他的非戰思想，是由其「知止不爭」的論理思想而來，因此，他主張去兵以求和平。他去兵之術便是在以「柔弱克剛強」。不然，即使用兵以強制服人，也是不可久遠的；因爲「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他的這

種思想影響給於後來中國政治以重大的影響，其影響於國防的建設，可說與儒家的王道說具有相等的力量。

主張兼愛的墨子是強調着非攻的。他在「非攻上篇」論攻的不利；在「非攻下篇」論攻的不義；所有一切的議論，都在用嚴密論理，以及層層剖釋的方法以見戰爭的「不利」與「不義」。可是，墨子雖然非攻，却完全是在反對私人的侵奪爭殺，和攻擊的對象在強侵略；至於爲了保障國家社會的生存計，必需具有抵抗力，實有嚴密守備的必要。因此，他說：「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若攻之。」又說：「其爲甲盾伍兵，何以爲？以禦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伍兵者勝，無者不勝。」由他這段說法，再加上在「備城門」，「備城傅」諸篇中所論的守城備敵方法，一個國家只要不是在遂行着不利不義的侵略戰，爲了抵禦外侮而措辦的國防建設，是一個國家所必需的。

上述具有非戰思想的四位中國先賢，每一個人在中國學術上都成了一家；而每一家的創始和擁護者，又都僕僕皇皇，爭思以其道易天下。結果，如果某一學派的人得志，只要

備應力有足以左右政治的力量，當日的國防建設每每感受着他給予的嚴重的影響。

本來孔孟也正如墨子似的，僅在非難侵略之戰，而對於一個國家防禦守衛的抵抗戰，爲了民族生存而發生的神聖戰爭，並不是一味的廢棄不備。尤其是孔子的「嚴夷夏之防」的思想，不僅成爲中國數千年來民族意識的最高範疇，而日本能有今日之強盛，也是很得力于吸收到此種精神，從而發揚光大之。

關於孔子，固然現今激進的份子以爲他的倫理想削弱了國家的命脈，使人專注重于「家庭」而輕視了「國家」，不過，他的「嚴夷夏之防」的訓教所給予後世以民族意識疑團的影響，早爲一般有識者所承認，我們是不能盲目的根本剔除。

自然中國的先賢們是標榜「王道」與「和平」的。可是在文獻中所表現的却并不盡然，而在民族意識方面却還是與別的國家一樣的強烈。所謂「和平」，所謂「王道」，那只是成了一種民族意識的最高範疇；對內是以「和平」與「王道」治天下，對外是以「和平」與「王道」去撫綏或抵禦外侮，絕不會純然佔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以拓土開疆，窮兵黷武爲能事。（如秦皇漢武的行徑，後世均一致的加以非難。）卽如上述的以「和平」與

「王道」相倡導的儒家，在承平之世固然是治平的輔弼，然而一至亂世，他們更顯出了他們之「實用」與「涉世務」。春秋一書中所記的「內諸夏，外夷狄」，不是當今德、意、英、法、西、斯國家所標榜的「超絕愛國主義」(Chauvinism)而是我中華民族極早的民族主義最高原則之樹立。自是以後，我炎黃裔胄雖然數次忘於胡族，卒能光復舊有山河文物者，都是收效於「嚴夷夏之防」的古訓。據已故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意見，孔子作春秋而多言齊桓與晉文之事的原由，因為管仲能「攘夷狄」，不然中國披髮左衽之嘆，恐早成了事實。怎能掙扎到數千年後？繼後秦皇漢武之攘夷，以至歷次異族內侵之不能成禍，而一直到晉朝始有五胡之亂者，這九百餘年間中國之能或金甌之勢，都是源於「內諸夏，外夷狄」的秦義秋之的遞相傳習，綿延不息。更是自此之後，中國雖有宋明兩朝的被異族征服，然而也卒能先復者，此九百餘年間之餘澤也還是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大義的效力。(即管仲尊王攘夷之事。)

在中國文化遺產中有了這種深固的民族意識，故中國能在經過多次外患侵陵中，經過多次的滅亡與復興，直能巍然獨存至現在。雖有「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的古訓，雖有

古重先賢非戰的主張，雖然在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咒詛戰爭的描寫，但仍能循着所謂「
 之師」的途徑，在不侵陵外族的原則下從事於自國疆土的捍衛。

(二) 中國古代軍事家的戰爭觀

近年來因為外患的頻臨，東北四省的失陷，以及華北的特殊化，緬懷着五千年來黃帝
 子孫的偉大文物，常常使人發生國脈將斷之感。然而三年前蔣委員長發表的對外宣言，却
 明白宣言「吾人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後的努力。」即是說，和平未到絕望
 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人們對於一個負有國家軍事最
 高指揮的人所發表的有「和平」傾向的談話，在羣情激昂的當時是認為未足的。然而誰知
 這種「和平」的高唱是與「犧牲」相連的，并不全是在以「和平」的方法，屈辱以免「犧
 牲」。如果以中國習用的熟語來說便是所謂「王道」。因此，試來檢討古代軍事家對戰爭
 的認識，對於牠給予後世的影響，對於抗戰中和平與犧牲的了解是有很深長之意味的。

我們試一翻閱中國歷代的史乘，都是王道思想的表現。自然，伴隨着政治而為升沉的

軍事學，也不得不以王道思想為標的。因為兵凶戰危，聖人乃是不得已而用之。孔子在對治國根本的答問上，主張足食足兵，在不得已而去時，又以去兵為先。孟子和孔子一樣主張以仁義治天下，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儒家的思想雖是在漢朝始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然而在孔子以前的名將們的思想却早也是王道的。——現在試舉孫吳，尉繚子，六韜三書等書中的王道思想，來作一個佐證。

孫吳的兵法十三篇，在真偽方面常是聚訟紛紜，但是至少可以代表當代的軍事思想。關於他的學說，宋梅堯臣評爲「戰國相傾之說」，但是在作爲始計第一的文中却明白地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這便是在與師起事之初，先審己量敵而計其勝負之情的意思，如能細校五事而索其情，則勝敗不難預測。但是他又把「道」列於五事之首，可見「道」之重要。據趙虛舟的詮釋說：「道者，天之所助，故次道。地可避而天不可爲，故地次天。將可學而地不能，故將次地。有善將則有善法，故法次將。」那即是說，用兵者以能用「道」爲先。因爲道是「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畏危也。」（孫子）這種道的解釋雖說是「有道之君」的本分事，但是歷代賢者之用兵，沒有做到這點便無所恃。我們試一細察孫子辭言，頗與歷代有道之君底行徑相照合。因為要令民能與上同意，能可與之生死，非辦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與民同好惡；省刑罰，薄稅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然後可臻王道之境。這樣「王道之民，便會同心同德，尊君親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耳目。」可以與之同生死，一切外患與戰爭都不畏怯了。但是在實際的運用，孫子也並不是主張逸乎道的範圍以外，忘事窮兵黷武，而這是一本玉道的思想，「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只要一翻檢孫子十三篇中，他就常常以多殺爲戒，處處顯露着惻惻恤恤之意。

與孫子同爲人樂道的吳起，也同具有王道的思想。他說「道」是「反本復始」的，即行事物之所當行，而反求根本，藉以復還其始初之稟受。因爲人之初生，渾渾噩噩本無所謂善惡，人人均能持「歸真返璞」之意旨，一切鬥爭均可逐漸戢息。又曰「義者，所以行事立功。」意即是說，行事立功必本乎心之制事之宜，如湯武之伐桀紂，因是順天人而伐罪，故可謂合乎義之戰。反之，「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之。」這

種不能修德之害，必至敗國亡身。『是與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勸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爲立國之基本要素，正所謂『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是也。果能如此，不論制國或治軍，以禮教之，以禮勵之而使有恥，因爲人一知恥，勇便以生，而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了。

尉繚子在論制國時之運用禮義廉恥，較之吳子更進一層，戰威篇說：『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饒易飽，國必爲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之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後只言王者應以禮信親愛孝慈廉恥率其民，但是，國不治而不能用兵，也即是未與師前的先決條件。

太公的陰符篇被認爲詭辯之士及後之言兵者所借託僞造，但今世所流傳的太公六韜和三略，至少是後代依據當時事實而作；我們至少可以相信，那些去古未遠的東西，也可以供我們一部的參考。因此，現在也根據坊間的六韜三略來略論到他所用以輔弼文王的軍事政治上的王道思想。他本是布衣而以魚釣干文王，文王載歸而立爲師後，一切大計都聽命於他，極力「陰談修德以傾商政。」試觀他在初對文王問天下歸從之道時的答辭，即已滿

含着王道的思想，而始終是與文王的行蹟相合。他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這便是天下爲公的思想。又說：「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聽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由此以推斷諸侯之心悅誠服而歸順於文王武王，我想都是太公之謀，正所謂同天下之利以得天下者是也。世傳黃石公推演太公之法以授張子房的三畧，也還認爲道德仁義禮五者爲一體呢。

從以上所說的幾位名將的言論看來，不單是不以兵爲得天下的利器，而且還諄諄然以道德仁義禮等相尊尙。其他如政治上所表現的，那自然更是王道思想底結束了。故爾，王者之師，每每是弔民伐罪，解人民於倒懸，或是爲了隣邦不仁不義，爲了正義，不得不爲了文化的感召而臨以干戈，只要一達到其預期的目的，便讓其自治而絕無領土的野心。我們今日之禦外侮，上下都是抱着王道思想，外而求國際之共存，並無侵隣思想，內而自強自立，極力滌除沉迷陷溺昏邦亂儒的惡習。也許這即是蔣委員長所謂不濶和平與不輕言機

牲的一種思想上的繼承？

(三) 中國戰爭思想給與日本之影響

在全面抗戰的今日，中國人心目中共同的唯一敵人，任何人也毫不遲疑的，答覆出透：日本帝國主義者。然而，日本何以能有今日？這是了解同文同種的人們所忽視而不能了解的。

中華民族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曾在一文中論到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作了詳盡而透闢的說明後，侃切地說：『要抵抗日本，就首先要抵抗他的武士道精神。』而且他認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頗資我們的啓迪；因為武士道的精神正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似的，一經傳到了他們的手內，從而便增補了他們的民族精神，使之發揚光大而為立國之基。

日本的武士道是形成於接受西洋文化之後，那時正是儒家的學說和精神感召於日本文化最深的時候，她從而接取了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來建立社會；儒家「尊王攘夷」的思想來捍衛祖國；以忠，孝，禮，義來確立人與人的倫理關係；以廉恥來約束個人慾念

，智，仁，勇，來鼓勵個人報國的精神；用法家的明是非，重賞罰來維持社會。——尤其是日本人常向世界所諱耀的武士道精神，幾乎是導源於儒家。因為武士道的內容是忠君愛國，尚或剛健，正直淡泊，所以武士道的主體即要武士們重禮，義，廉，恥，信，義，厚樸與熱情；他們有了儒家的講氣節，重義，明恥等思想之傳授，更增補了武士道的內容，從而孕育成了所謂日本國魂底「太和魂」。

從表面看來，似乎非戰的儒家不會影響到日本的武士道；可是，有了忠勇，構成了成功與成仁的事實現，今日日本軍人的自殺，以及民間的「切腹」精神，節都是與儒家成仁訓教有關係的，有了「尊王攘夷」的精神，使日本由弱轉強，由強而轉向了帝國主義。

孔子雖不是軍事家，可是給予了日本軍人極基本的元素。若從他們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以及孫武子給予了的影響；他的珍言現今還被日本軍事家與政治家習用着。因此，軍部在孫子的「攻心爲上，攻城次之，」的感應下做出思想戰，在所謂「詭道」（孫子曾有此語）之兵外附飾着「王道」的假面目，因此，在他軍事家的眼目以及宣示下，侵略滿洲是所謂「王道」，向南洋羣島的南進是「宣揚王道。」——在他們看來，「王道」便是日本

的侵襲所以異於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地方。

俄國軍人郭泰納夫上尉 (Capt. Anotko in. Kalenev) 在他們的「中國軍人魂」一書曾認定：中國軍人忠勇精神自從唐時傳入日本後，以後一直增強，直至現在還是繼承着。他的觀察雖然僅局限於這一點，但看了上述的一切，在所謂武士道精神積極向中國國土馳聘之際，意味到時會有無限感慨的。

第二章 中國軍人的特質和精神

(一) 中國軍人的偉大

(二) 中國軍人與孔子思想

(三) 中國軍人與英雄崇拜

第二章 中國軍人的特質和精神

(一) 中國軍人的偉大

從上迷先賢的訓教看來，也許便是數千年來構成中國人愛和平的思想上底來源。不過，這并不能便消滅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却常隨伴着「嚴夷夏之防」的思想而升沈；因之，在上者還能具有足以誰繫國脈的中心思想，而遂行戰爭行爲的兵士，在潛意識中也還能爲自願的傳統思想而犧牲。

爲了中國歷代在政治上採取的都是愚民政策，故士大夫階級成了政治上的中堅份子；而歷代的所謂「養士」，也便是在培養協助君主統治的幹部，使其能盡臣奴的忠貞與犧牲。換言之，即是國家要士大夫階級來支持民族意識，把民衆視作黔首愚民。可是在事實上，士大夫們却恰又不適于作民族意識的支持者。關於這點，陶希聖在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認爲不論是在何種統治情形之下，士大夫階級「在中國民族壓服或同化異族的

時候，他們以宗族傳說隱蔽並消滅了民族意識。在中國民族受異族壓迫的時候，他們第一只能夠藉門第宗族意識來保持血統；第二却又因政治地位的爭奪，雖引進外力或屈服於外力而不以為恥。」這樣，在戰爭中犧牲的人自然是所謂愚民黔首；他們是與整個國家民族的利害無關係，而只是爲了「重祿重賞」之所驅使，（此是管子用兵時的主張，以後的將兵者也是採用的。）在戰陣中衝鋒陷陣，爭進而無止。而那些居於上層構造的人物却常是：居則擺出詩人和文士的風度，出則總統帥干，直接担负起戰爭的指揮責任。可是以這批僅具着薄弱的民族意識而又缺乏戰陣經驗的人來作捍衛疆土的工作，勝利與否只靠着被「重祿重賞」維繫着的兵士，其結果不是僥倖成功，便是不抵抗或一擊即潰。

可是，中國自古雖然不看重兵士，而在歷史上的若干次戰爭，又是非有龐大的兵卒不能遂行的。在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第一個研究中國軍事學的位基督教神父愛米阿特（Amiot）曾讚嘆說：「多麼勇敢的軍人阿！多麼偉大的英雄阿！」或許他並不會深澈中國兵士的素質，而只是看到兵士們犧牲的勇敢和壯烈，而中國兵士卻自有其偉大之處在；而他們的素質和精神卻也有其特異處。也即是說：西洋兵士有他們從幼小時便培植起來的國家觀念

，和死後天堂的幸福，日本士兵有他們忠君愛國的所謂武士道精神，中國兵士如果沒有一種特質和精神，軍隊的組織早已消滅了，怎能在過去的幾千年中抵禦若干次異族的侵逼？更不能在二十世紀時抗拒帝國主義者的侵陵。因此，在全面抗戰的今日，試來檢討中國兵士的精神和特質，至少是可以增加人們對英勇的戰士底了解。

（二）中國軍人與孔子思想

近來，因為中國要克服當前所有的危機，和拚力擊退一切外來的侵略，激進的人主張澈底地改革現有的各種社會機構。像宋慶齡女士在美國亞細亞雜誌（*Asia*）中國當前的急務一文裏，認為中國的社會機構正急劇地在變動着，要解決由這巨大的變動所引起的各種問題實在極為困難。因之她主張極應祛除孔子的保守主義，把孔子的影響從我們的生活和思想中間連根拔出去：原因是他的教義完全建立在傳統上面，阻礙了科學和社會制度的發展。她的立論也無非是要使一向保守于家庭而不能為國家民族利益犧牲的人轉而成爲捍衛祖國的鬥士，「養成軍人的精神，學習現代的軍事技術。」不過，在這一點上我有些不同

的意見。

孔子雖是非戰的保守的，但是他的「嚴夷夏之防」和所謂「三綱」的思想却是數千年來民族精神的支持者；試一檢討中國全部的歷史，便知「嚴夷夏之防」的主張成了士大夫階級民族意識的基本要素，而所謂「三綱」便是民衆和兵卒們的最高倫理思想。西洋人當在了解中國時便認作神秘，他們對這支持士大夫與兵士們的一種範疇是難于意識到的。可惜的是，過去這種思想並不會強調而成爲一定的策略，以致所謂國家的「養士」只是養和卸用，求其能在外患頻臨，國家危亡時死難殉節，已是難能可貴，而兵卒們之能拚鬥以戰，並不是爲了甚麼民族國家，只是爲了厚祿重賞，以及他種私人的利益。

自然，我們對於孔子所留下的保守思想不能不給以廓清，這是由于後世的迂儒只膠着于他「法先王」的意識而弄成了泥古守舊，不法先王的都認爲是離經叛道；如果能把他的訓教活用而現代化起來，中國當然不會像目前似的衰弱。像素昔被人所攻擊的家庭觀念，而在日本人運用起來便不如中國似的流毒甚深；日本自以爲國家機構之所以別于美國是因國家係由家族擴展而成，故能使民族膠固而成爲目今所盛誇的「皇道」；中國雖有此種精

神，但只定住于保守而不進取，故中日立國精神，由此便根本判別出來。

根據于上述的觀點，孔子的「三綱論」給于中國兵士精神上的影響是不得不述及的。

孔子的三綱是：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這三綱在歷史上所表現的事實是「忠君」，「愚孝」，「貞節」；其影響所及，成了中國社會最高的倫理思想；數千後由五四運動所舉起的叛旗，在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之下而要搗毀的便是這種舊禮教。但是，素來缺乏思想訓練的中國兵士，他們既是黔首愚民，他們不僅被主上象養着，他們又只爲了虛渺的重祿重賞犧牲；而所賴以維持其組織與遂行戰爭行爲的意識，如果不是忠君的思想在他們腦中朦朧的浮沉，中國早已是說不上有甚麼軍隊的組織。

他們由於忠君思想的薰陶，在上是忠於君主或其高尚的領袖，在下是忠於直接統帶的將官。在研究中國兵士精神的人中，只有俄國的郭泰納夫（A. M. Kotenev）在所著的「中國軍人」中體認到。他認爲「中國兵士所以能夠激發起忠勇的精神和殺身成仁，因爲他自幼秉承父母祖先的忠義教訓；這種忠義觀念，現在已成了全民族最重要的理想」。不僅過去的兵士是爲此，就是民國以來，黨軍的建立者孫中山先生，他在精神教育上也常是以

悍，仁勇爲骨幹；尤其是近年國防部隊的建立者蔣委員長，在他親撰的「步兵操典綱要」中，更是強調着上述的意義。因之，軍人們可以英勇而壯烈地捐軀於中國的邊塞蠻荒之地；他可以沉默的躺在內地的稻田和原野中；他可以在抗戰中從戰壕內跳出，舉起手榴彈來狂擊進攻的敵人，（此種英勇的情形，曾引起歐美軍事家的驚嘆，認爲即是歐戰中也沒有此種奇蹟。西洋兵士常是伏於戰壕中，而絕沒有如此壯烈的勇氣和犧牲。）如果沒有超越的特質和精神，他是不會勇於犧牲的。中國先賢們數千來年諄諄倡導的「成功成仁」的訓示，在「一時窮節乃見」的危急存亡之秋，我可以說，都在軍人的身上充分表現出來了。

（三）中國軍人與英雄崇拜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在他的精神史觀中提出了「個人階段說」，而認爲「個人」尤其是偉大的「英雄」實爲實現理性之最重要之手段。因此，他便提出了一種「英雄史觀」。他把個人的等級分做三類；第一二類的個人都是比較局限於狹小的範圍，和只對社會全體所與的道德上的任務；（即保存的任務）至于第三類的人，可說是「英雄」型（

known) 的，他不同于保存的個人的地方，則在有世界歷史的人格，而是更高級上的一個人。明白的說，他即是歷史上各個偉大的英雄。

所謂「英雄」，他乃是以偉大的個人供其犧牲，他自己的特殊的目的，就包含了那為世界精神的意志之實體的東西。他之值得後人的範式，純然是爲了他偉大的事業。了解了這個前提，我們對於中國兵士從歷史上的個人——英雄——所感受的精神上的影響是並不足奇的。

中國兵士因爲在歷代的愚民政策之下養成，對於先賢們的一些玄妙道理，不僅是與他們無緣，而且也是不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因之歷史上的所謂「英雄」乃至「豪傑」，都是他們所景仰而法式的人物。如三國時代劉關張的結義及其事蹟，影響到後世秘密結社的中心思想，以及兵士們忠義的觀念；水滸傳上的人物雖然大半是虛構的，但他們標榜的「替天行道」與「打富濟貧」的口號，即在若干年後，因政治不良天災所引起的農民暴動，仍是繼續着此種傳統精神，而由農民暴動中轉向的兵士們懷着同樣的思想，是自無疑義的。尤其是關羽和岳飛，可說是在一般兵士中神化了的英雄人物。關羽是三國時代與劉備

張飛結義以匡扶漢室的一員戰將，因為他的忠義精神，在他被害後以至今日，長江流域的民衆還把他當作家中的主神而供奉起來。岳飛是以「精忠報國」著稱，他當日矢志以收復失地自誓，後因奸臣秦檜的主和而終至下獄被害，他以後和關羽都被認作神化了的「軍神」，特立專祠奉祀起來。因此他影響到一朝的統治者，每在開國之時總要重新加封而且去祭祀他們，祈求新社稷的護佑；對於一般兵士們雖不曾有過直接拜祀的事，但每一個與民間秘密結社有關，或參與過農民暴動的人物，無有不從「關公」的忠義精神感受影響；有了此種精神的感應，他們可以在對外抗戰中犧牲；也因忠於自己集團內的領袖，甚至在烏合之衆的組織內，也有着壯烈的犧牲。

英國歷史家加萊爾(Th. Carlyle)在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 worship)中認為英雄主義最後的一種形式是會使人們屈服了大家的意志去服從他的意志，虔誠地馴順皈依，他給我們以永恆而實際的教訓，時時刻刻在引導我們應該如何做。根據他的說法，可用以說明中國兵士對英雄的崇拜，乃至由他所仰慕的英雄底身上獲得忠勇義俠等精神的感應，并非是無原因的。

自然，英雄主義也不是沒有流弊的；如政治不良時所謂羣民們的騷亂，封建餘孽的政治野心，都可以說是與英雄主義的發展有關。不過在這國步艱屯之際，中國兵士的待遇，無論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不及西洋兵士的若干倍，然而他們還能效忠於中華民族的自衛戰，並不是全可厚非的。因之，對上述中國戰士具有的特質和精神，我認為在全面抗戰的今日，是應加以特殊意味的。

第三章 徵兵與兵的素質之改造

(一) 中國歷代兵役制

(二) 軍訓與徵兵制的實施

(三) 軍訓與兵役

第三章 徵兵與兵的素質之改造

(一) 中國歷代的兵役制

稍讀文化史的人，都認為人類的歷史純然是由各方面的鬥爭而構成的。世界人類既不能說無爭，那麼，「戰爭」便不得不有，人類既有戰爭，那由民族而構成的國家，便不得不有「兵」。所以說，「兵」是國家戡亂禦侮的工具，應為非常之備，在不得已時始用之；國家之有兵，並不是為了製造戰爭，乃是為了戡亂禦侮之戰而備兵。淺識短見的人，總以為戰爭之起源是由於「兵」，因此遂以「佳兵為不祥」而忽視了戰爭的起源！他們沒有看見「戰爭」與「兵」的關係，貿然以「兵」為凶器。固然，兵足以鬪武，但兵竟為了甚麼而鬪武，怕不一定是領兵者的好大喜功，而原因却另有所在呢。

「兵」雖然不是造成戰爭的原因，但戰爭的形態却由「兵」所決定。古者，湯武之兵為弔民伐罪而戰；秦皇漢武之兵為定邊畧遠而戰；北伐之師，為國民革命而戰；直皖奉直

爾爾則爲爭奪私人地盤而戰；剿匪各軍爲肅清赤匪，實行先安內後攘外而戰；這一切的戰爭，都是「兵底一種行爲」，只是爲了形態的不同，所以意義便根本不相同。故春秋之記載戰爭，「征」，「討」，「侵」，「伐」等字義，在使用上都是很嚴的。否則一字之不同，戰爭的形態也呈現着異樣。現代正值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因爲人事日趨複雜，而爭奪也沒有窮止的時候。同時，戰爭的進步，特別到了嶄新時代，由戰爭所形成的恐怖程度，即使古人聽了，也必然爲之咋舌。戰爭破壞的範圍達到百數十里以至全世界，下起海底，中連天地，上至空天；實踐這戰爭行爲的「兵」，所有的數量不僅是悉及於全國男子少壯，甚至婦女也要武裝起來。戰爭底効力和範圍既有這樣的廣大，所以戰爭之變不可輕啓，兵更不可妄用。

然而兵的形態，現代和古代沒有如何的差別，現代兵的種類反較古代爲寡，種類的區別，也較古代爲嚴。爲戡亂而戰，爲禦侮而戰，可以爲一國之利益而戰，可以爲兼併人之國而戰，至於純全爲一二人之好大喜功忿而戰，現在已不多見。我們推源其故，不是因爲戰爭的進步，也並不是爲了兵的變遷，更不是人類底信義日臻高尚，乃是決定戰爭形態的

兵和兵底素質有歷史的變遷之故。

國民乃兵底源泉，兵底素質便是國民底素質；國民素質的變遷，也便是兵底素質的變遷。人的意識隨歷史而轉移，乃是相應於一時代的需求，不能從人以自由意志而決定。在革命後，人的意識起了一個根本的變遷；中世紀以下的國家制度，已經應這種變遷而轉移了。國家制度一經轉移，兵制即使不隨之轉移，但兵的素質，必然地隨伴着人民意識的轉移而潛移默化。所以說，歐洲大戰時之兵，非復拿破倫時代之兵可比。我們試一追溯的變遷，便知道其中有歷史的淵源存在；假如兵制不隨着歷史而轉移，在現代戰爭中，不要在疆場上也便可以決定牠的勝敗。

我國徵兵的制度起於三代。假如追溯牠的起源，則先民未有弓矢之時，徵兵的雛形便已存在。夏殷寓兵於農，五丁抽二，或三丁抽一，儼然是一種徵兵制。降至周朝，軍制益備，軍賦是出之於井田，鄉士命為將帥，兵民不分，選擇有歸，練習有節，以致民無久戍之苦，兵無坐失的顧慮。這種寓兵於農，使軍卒在平時從事生產的工作，算是軍制極善的表則。故那時雖北有猃狁，南有百蠻，西有西戎，東有九夷，也都稽首聽命朝西周而莫敢

抗命。然而到了春秋之世，完善的周制，逐漸衰敝，管仲相齊，作內政寄軍令，因兵農之歸一，尙能伐山戎，撻荊蠻，終爲五霸之首。至於商鞅，便大變周朝的舊制。好在他能令民什伍相收連坐，人民終於能在十年之間，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直到發商鞅行，兵制便趨於大壞了。漢高祖取秦而代之以後，雖承秦法而行徵兵之制，但與周制仍然無大差異。所以漢武帝卒能使用寓兵於農的兵制，拓土開疆，發揚大漢的威振於海外。光武中興後，他並沒有拓土開疆的思想，他志不在遠，意只注重到兵不常聚，將無常員，故爾材官騎士，布滿羣國，有事便徵召而來，無事便罷歸田間，不致爲國之憂。兩漢之所以無敵國外患者，不僅由於軍隊之強，而實因網維素具，備禦有方，陶冶得法之所致臻。唐朝的強盛雖及不上漢朝，然而太宗時尙能實行近古的府兵之制，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爾士不至失業，將無違兵之重。以後兵制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兵與將之尾大不掉，反成了朝廷的大阻礙。宋明兩朝的太祖都想恢復民兵制度，如宋朝王安石之厲行保甲法，明太祖時劉基之軍衛法，都是採取唐朝府兵的遺意。只爲了立法的不完備，或用人不愷積久而弊生，兵農合一的兵制，始終不能實現，卒至

因備兵而敗國，成了不可收拾之勢。

我們細考中國歷代的兵制，都是以寓兵於農的徵兵制為主，只要是清平之世，國家總常以徵兵而剔除一切的弊端。由三代至唐約二千餘年間，只有魏晉時的兵制是最壞，魏時不消說了，晉在承繼魏祚之後，因為三國時的混亂，兵制早已蕩然。又兼之以士尙清談，不習實務，所以只有崇尚召募。終至五胡十六國蹂躪中原，烏桓柔然突厥縱橫近塞，歷六朝而禍不息的原因，都是導因於兵制的蕩然，兵多召募的原故。漢唐以後，徵募有時兼用，然而徵兵的制度却從未廢棄。明清武功不彰，沒有甚麼值得稱道的，但兵制與當時的國家政制不侔合的，迨至海禁大開，西洋人甲艦槍炮威臨中土，於是遂然產生了新軍，購入武器之不足，又設廠自造；延聘外國教練之不足，又與辦水師講習所，那時變法諸人，更要圖謀變易政制以適應這種兵的變遷。實在說來，兵的形不可說不備，其勢不可謂不盛壯，怎麼辛亥革命事變一起，這種「完備」而且「盛壯」的兵反而傾覆了清室？繼後，北洋軍閥的封建份子不只是繼成了新軍的正統，而且又爲新軍之創辦人。但是他們戰爭形態并不是爲國家民族，盡人皆知是爲了私鬥。上述的一切，原因不在兵器，不在戰爭，也不在

兵制，而根本的原因乃在兵底素質方面。不然，人民的一般意識薄弱，社會腐朽，政治衰敗，雖然有堅甲利兵，實行辦到了盡人皆兵，這樣的兵也沒有甚麼用處。正如書經上所說似的：「紂有衆億萬，爲億萬心；武王有衆三千爲一心。」因爲衆志成城，便從而決定了紂王敗亡和武王的勝利。即是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這個鐵則也還不能破除。

兵的制度是由國家的立法所決定，一國的立法是適應於一國之國情，而兵的法制尤應衡量國家的國防情狀而定，決不可以任意左右。漢唐過去既已實行徵兵，後代又從而非之；法蘭西和德意志是實行徵兵的，但是英美兩國又不是絕對的實行徵兵制度。這竟是孰是孰非，一切都要受立法和兵制的限制，並不是由一個人的意志可以隨便左右的。我國自淞滬與華北戰役後，中國軍隊必須改革的呼聲，直如風起雲湧；大家所看到的，多着重於質而不重於量了。這種主張，正是切時弊而無可非難的。然而所謂軍隊的質，究竟是指兵器呢？或是指兵卒呢？抑或二者并指呢？我們雖然不敢輕重於其間，但是竊觀今日中國軍隊所急的，兵之素質居其首，而兵器的充實在其次。假如沒有良好的兵卒素質，縱然武器充實而與他人均等，恐也未足以禦侮。現代中國的兵卒，固然也有禦侮的戰爭觀，但是

這些兵卒們所具有的戰爭觀，只偏於個人的熱情，而忽於對國家的理智；熱情縱使可以久持，恐在禦侮之後，未見有改於軍人現有的流弊。又何况熱情是速發而不可持久的呢？

那麼，兵卒的素質究竟從何改造呢？依我的意見：第一是安定社會；第二是恢復農村；第三是普及教育；第四是增強政府力量。因為社會安定而後人心安定；農村恢復而後民氣昭蘇；教育普及而後人民意識向上，理智充實；政府有力量，非但前三者可以推行無阻；就是凡百事業均有可為。四者俱備，兵種水準自然增高，兵的素質，不教已屬良好；而對於軍事技術的訓練，戰鬥意識的養成，也必比較今日的兵卒容易實施。像這樣，徵集而加以訓練，纔不至為烏合之衆，在戰爭形態上纔可以盡量的發揮其效能。試看歐洲大戰中，在東部前線相持着的德意志和俄羅斯，他們作戰的兵士都是由徵兵而來，而且俄軍數量又數倍於德，從形勢上看，德國必致敗績。然而魯丹倫堡一役，俄軍一潰而不可收拾，反致因敗績而引起內亂，以至毀滅了俄羅斯帝國，這是一個兵底素質不良的一個很好例子。再如歐戰末期，德國和法國原有的兵卒都倖存無幾，因此，雙方都以服初年兵役的青年補充；這般青年既無訓練，又無堅固的戰爭意識，其失敗也無疑。後來法軍得美軍的增援，

幸免潰敗，而德國卻因為這無訓練的青年徵兵人員而退却乞和，釀成了偉大的政治革命。德國的教育和產業原都帶有很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而且一切的水準都高於任何國家，而在事實上這免不了爲着原有兵卒之傷亡而致敗績，其他的國家更不消說了。

(二) 軍訓與徵兵制的實施

從上所論，中國歷代差不多都是以徵兵爲主要。只有清朝才全注力於備兵制度，爲了備兵的腐敗，或許可以說，便從而傾覆了清室。清朝末年，直蘇皖鄂各省雖也嘗仿行徵兵制度，但都爲了辦理不得其法而未收圓滿之效。改元以後，雖曾提出「徵兵計劃」有規定第一期實施於河北，河南，山東，第二期於各行省擇要區實行，第三期實行全國徵兵的擬議。但因政治上軌道，也只成紙上談兵而已。一直到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才公布了國民兵役法。醞釀多年的徵兵制度，到現在才算確定了。

關於全國人民服兵役的事，國府又曾於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明令說：「圖強之道，首在足兵，近代世界各國，率行通國皆兵之制，我國古亦寓兵於農，卒伍之衆，出於廩井，

徵世專用召募，兵農遂分，沿襲至今，迄未革新，大多數人民安於罷戩，民族意識，坐是銷沉。且以養兵需餉綦鉅，國家財力，絀於供應，遇有事變，仍慮全國幅員廣闊，不敷調遣。若非及時簡練民兵，改良軍制，其何以供戍守而固邊防。查兵役法前經制定明令公布，自本年三月一日切實施行，現已由主管機關選定各師管區，應按照程序，逐步推進。茲特剴切申令，凡我國民，須知履行兵役，為人人應盡之義務。際此國步艱屯之時，宜有發憤自強之計，徵兵制度，為充實自衛力量根本要圖，各國行之已久，急起直追，未容再緩，務期全國人民一致醒悟，共策進行，其依法應服兵役者，尤當淬勵奮發，踴躍應徵，於以復興民族，鞏固邦基，有厚望焉。』

從上面的命令，可以見出我們的國家是在這非常時期中強調了三月頒布的兵役法。第一，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為了革除傭兵制度的積弊，企圖逐漸以徵兵制代替牠。第二，為了應付國家眼前的或猝發的非常事件，應積極努力於全體國民的明瞭教職，使全體國民都能在國家總動員時，英勇地獻身於國家。

中國的徵兵制度由來已久，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實可說是國民實行兵役之

始。後代因爲歷朝衰憊，每以「士」居四民之首。把「兵」認爲一種「賤役」，不算是正當職業。這樣的心理籠罩了一千年，社會上產生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諺。一個人除非個人的生活或環境，逼迫到萬不得已時，是不屑於去充當衆人賤視的「兵」。因爲過去二千多年的兵，是由召募而來，所以多屬市井無賴和亡命之徒。這在一般稍有智識的士農工商看來，便認爲當兵只是替少數人們去做護衛，去供驅使；除了爲謀衣食而應募外，有職業的人都不願自輕自賤的去當這種廝養的兵。從另一方面說：凡是當兵，就要把生死置諸度外，並要具有好勇鬥狠的殘忍性情，方能合格。這在一般善良性懦的人，一定望而生畏，所以歷來的兵，大半可以說是流氓與流民的專業，很少有甘願放棄了現有的所謂正當職業，而去服兵役的。而且願意應募當兵的人，唯一心理，只求能維持目前生活，並藉此去欺侮良善。如遇到戰爭，更可以發揮其平時壓抑着的殺戮掠奪的預期本能。這樣，過去國人之心理，其不願服兵役者，固然未能認識兵的真正涵義，即在兵的本身，亦未嘗了解所以當兵的責任。如此，國家雖然擁有衆多的國民，募有龐大的兵額，只是虛糜國帑，於國力的滋長，是毫無補益的。便是，所謂兵也者，是要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其唯

一任務，也就是守土衛民。大凡一個獨立國家，領土主權，必定要完整的，如果一但遇有外力橫加侵畧，要想做到尺地寸土，決不喪失於人，固然是一般國民都有應盡的責任。然而兵士則應站在全體國民最前線。因為兵是有武器的國民，是負有使用武器去達到保守疆土的重大責任；同時也是護衛沒有武器國民的前衛戰士。所以兵的責任，是極其重大，絕不榮，是為國家民族的生存繁榮所寄託的。然而，如果說是像朱執信先生在「兵的改造及其心理」一書中所說似的，平時只為了維持生活，戰時又只在發揮其素昔壓抑的殺戮掠奪的預期本能，而在素質上又是流氓無賴，如此，即配置以近代的武器，又怎能望其能達到守土衛民的偉大目的呢？

現在國難已嚴重到了最後關頭，國民常以軍人不抵抗，或不能捍衛祖國來責備，軍人也常以國民不能作盾為憾事。其實，這些都是導源於傭兵制度，大家都把守土的重任加在不及全民四千分之一的傭兵身上，自然素質低劣的兵士不能達到衛國的責任了。「當此國難嚴重之際，領土主權，隨時都有被侵奪可能，我們要想發揚民族精神和鞏固疆宇，使敵人無從逞其侵奪野心，唯一方法，只有我們全國民衆，都要做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一

步：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全國民衆，都需要立刻武裝起來，絕不應當再存蔑視兵的心理。或意圖規避，甘爲懦弱思慮的人。我們應當以得服兵役，爲無上的光榮，爲最高的任務，踴躍應徵，一致奮發！這樣，庶幾足以應付當前的艱屯局勢，纔可以置國家於長治久安之境，而不隕墜。」（蔣委員長語）這樣，即是所謂「足兵」，亦即孔子所謂「足食足兵」的「足兵」，是全民皆兵的「足兵」，並不是常備兵員數千百萬的「足兵」。因爲今日世界的戰爭，不僅是少數兵員的戰爭，實在是全體國民動員的戰爭。目前以常備兵的數量論，中國自然是甲於世界，但是就事實而加以推論，我國的兵額如「按人口來作比例，比較任何國是都少。因有許多國家的常備軍額雖低，但一遇到戰事，後備兵士，馬上可以召集起來，最高數目，幾乎可以達到全人口的十分之一。譬如日本，常備兵額雖祇二十多萬，但在戰時，至多可召集到六百萬人。蘇聯的常備兵，現在雖祇一百多萬，比較中國還少的多，但它到了戰時，最後可集中到一千三百萬人。它們這些後備，預備兵士，集合起來，立刻就是正規軍隊，並不需要臨時訓練。我們怎麼樣呢？不客氣說：除了現在有的所謂一百多萬（？）的常備兵外，另外一個兵士都沒有了。人民雖多，有何用處？臨時召集既沒

方法，就算召集起來，也是烏合之衆。既云對外有事，所謂「外」者，它決不是等你把些烏合之衆練好以後，再來和你作戰。并且按中國的幅員來說，百萬以上的常備兵額，也不見得怎樣太多。所以「精」固需要，「足」亦不能是算是沒有問題。」（同上）中國今日所需要厲行的「徵兵制度」，也是要使全民皆兵，從而加強國家的軍備，使在非常時期可以實行動員全民去應付事變，不是以單體的掙扎去抵抗敵人集體的突擊和侵略。

迷信「王道」或「和平」的人，也許以為這是軍國主義者或黷武主義者的論調。不過，這也難怪他們，因為當今窮兵黷武的各帝國主義者，大都是實行的全民皆兵制度，只有少數國家是徵募兼施的。又何況他們目視中國歷年來的兵禍，免不了要為徵兵的前途而懷着驚慌之感。其實我們中國古代的被人贊誦的文化，也不只是單獨偏於文治的，而是文治與武功交融的結晶。即如為禱王道者所尊崇的孔子，也主張「足食足兵」，只能在不得已而去時，主張「去兵」，并不曾絕對主張廢兵。而且警告為政者說：『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所謂教民戰者，就是使民衆之耳目手足嫻習於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準備着非常時的使用。如此，即所謂教民「知恥」，而「知恥」又近乎勇，知恥明恥即所以教戰了。

所謂明恥的說法，也是佔兵的意識之主要成份。因為古人是以「知恥」與「明恥」教人，如能做到「知恥」與「明恥」，便是實行了禮義廉恥四維的一維。古人所謂明恥教戰一語，是深澈了四維的精神，從而成遂着「明恥教戰」的偉績。不然，以不知恥明恥的人而強欲教以作戰，也等於是為淵驅魚，白白地犧牲了編氓。

從前中國的古聖先賢教人，無論是家庭或社會與學校的教育，都是「文事」與「武事」并重，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不單是要使受教的人通曉文事，武藝也必須要懂得。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武藝，非但不能保衛國家和民族，就是要自衛或保護鄉里，也是不能辦到。然而爲了後代崇尚清談，逐漸使文武分途，各行其是，馴至造成了重文輕武的風尚。如此「文武分途」，如此「術德分修」，民衆的體力又焉得不日趨衰弱？國家民族又焉得不走上死亡的線呢？

蔣委員長說：「我們要做現代的國民，要從衰敗危亡之中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就要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惡習，恢復古人「文武合一的教育」。要使全國同胞無論男女老少，都有武藝，都能自衛衛國。」因為當今世界的各大強國，全是與我們的古人教人似的，實

行的是文武合一的教育，例如英美法日俄，尤其如近代各新興的國家蘇俄土耳其奧德意志，不僅男子要習武，就是女子也要習武，所以他們能夠發揚剛毅的民族精神，造成磅礴偉大的民族力量，完成復興與國家民族的偉業。因此中國的將來，只有「文武合一」才能挽救。否則，「文武分途」，在國基上便不免有偏枯之感了。

(三)軍訓與兵役

中國提倡尚武教育以挽救衰弱，自鴉片戰爭後，便為一般愛國之士所盛道，然而所謂軍國民教育之總不能實現的原故，實由於中國的積極已至昏盲時期，非有猛烈藥石不能達其糜腐。如果只是愛國者的呼噪，而沒有鉅大的外力之壓迫，又何能見諸實行？

然而在九一八後，因為外侮的日急，麻醉的神經，不得不因為東四省的失陷而起着一度反應；更是在一二八戰爭以後，感於新軍的調整，以及民氣的重要，若干年前所謂的軍國民教育，而今才以國民的軍訓代與了。軍國民教育的說法雖已成了過去，但是牠的實質在今日各國還是不變，不過是另以新姿態出現罷了。中國拋棄了軍國民式的尚武教育而來

作普遍的國民軍訓，原因是爲了中國今日是非常時期，一切的外力的緊迫是不容我們好整以暇；所以，普遍的實施國民軍訓，其意義是深遠而且重大。

關於軍訓，如在德意俄以及其他諸國，本是極平常的事，因爲若干年來，便是在各種形式下實行全民的軍訓，用不着特別提出。雖然近年來，各國都在極力提倡體育與青年訓練，然而也正是軍訓的志現，無非把軍訓的精神換個形態出現罷了。可是，在中國，不免在內而遭受封建殘餘的冷嘲，對外引起別國異樣的感覺。在最近一年來，好在一切的障礙已行祛除，無論說是軍訓也可以說是體格訓練也可以，而精神都能保持一貫。恰如與波蘭，德意志，奧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國似的，退可以保持國內的秩序，進可以復興民族，挽回國家的危亡。

然而我們也得瞭然於軍訓與兵役的意義。簡單約說，軍訓即是公民訓練之側重於軍事訓練方面的；也即是說：公民訓練是偏重於政治訓練而以軍事訓練爲附；國民軍訓是以軍事爲主而以政治訓練爲附。根本的意義可以說是一致的，只不過通行的場合不同罷了。

據可公開的事實告訴我們，軍訓的目的是在實行全民的軍事化，以期每個人都能爲國

犧牲，捍禦外侮。而最大的要求是要全國民眾，只要到達一定年齡，不論階級與職業，都要有健全的體魄，忍苦耐勞的精神，充分的軍事知識，足以應付任何對外的戰爭。

蔣委員長前三年向湖南學生集中軍訓時會說：「受訓的目的就是要救國」，其意義更為明顯。這種軍訓似乎與徵兵的意義近似，然而在實質上却是同歸而殊途。因為徵兵的意義是要以「徵兵制」去代替「募兵制」，從而提高兵的素質，減輕過度的糜費，廢絕軍閥擁兵自雄的事實。可以說是一種有組織，有訓練，有酬報，有勤務，有定期的。全民的軍訓則反是，軍訓的目的不過是企圖實行「全民的軍事化」。在另一方面說，在徵兵臨到時他們是預備徵調的兵，在國家對外有戰爭時，他們是預備兵，或是後防的維持者。

這種情形，在歐美各列強中，早已是行之有效的固定的國策，平時維持地方秩序，鎮攝叛亂，戰時服務疆場，為國犧牲，都成了各國公民訓練中共通的目標。中國今日之流於半殖民地，公民訓練的無策，募兵的流毒，實為很大的關係。目前對這兩者的強調，所謂非常時的非常訓練，是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我們只要體味到前年（二十五年）中央頒布的軍人讀訓十條，便可知那十條是基於「犧牲自己，為國為民」的救國精神而釐定的。

現在將該十條中的捍衛國家，服從長官，敬愛袍澤，保護人民，盡忠職守，奉行命令，嚴守紀律，勇敢果決，團結精神，協同一致，負責知恥，崇尚武德，刻苦勤勞，節儉樸實，注重禮節，整肅儀容，誠信修身，嚴守信義等的精神，以之訓練軍人，訓練民衆，時日既久，必能發揚出所期許的救國精神。

第四章 抗戰與中國軍人素質之嬗變

(一) 過去中國兵的素質之腐敗

(二) 太平軍與中國兵素質之改變

(三) 國難與中國兵素質之嬗變

第四章 抗戰與中國軍人素質之嬗變

(一) 過去中國兵素質的腐敗

中國的先賢們對戰爭的認識，既是像上述那樣的常帶着非戰的成分，兵卒身分之在他們眼中，自然也沒有如何高尚的地位。

歷代的帝王們對待他們的部屬，常是存着奴役的心理。而對於比較臣屬低下若干倍的人口，無疑的是把他們視作「黔首」「愚民」。「黔首」和「愚民」佔一個國家全人口的最多數，他們在平時祇足胼手的操作，以大量的生產供給在上的特權者們的消費。所謂平時納稅，所謂爲君主服役，所謂執干戈等，都是他們應盡的註定義務。儘管他們從君主處得不了甚麼實惠，但一有徵調，無論是何種戰爭，在淫威之下是不得不立刻實行的。

在過去的若干年流行着一種對兵士最惡毒的話語：「好鉄不打釘，好人不當兵」。細繹這種語句，好像是徵兵制廢而傭兵制代與後所發現的詭語；但帝王們既將臣民等視作奴

練，其給予人們對兵士以壞的觀念，至少是自有爭戰以來便行存在，不過在近古以及近代爲尤烈罷了。

「好男不當兵」的諺語之形成，既有上述的政治上的原因，加以農業社會經濟的崩潰，以及政府的剝削，天災飢荒等的迫害，走頭無路生計缺乏的可憐農民們，不得不變成流氓和流寇；而新朝的帝王和有野心的人，便在此等情形之下收集兵士，完成他們的企圖。如此流民們便只有視兵隊爲逃避所，以「當兵」作職業了。正好像朱執信先生在他著的「兵之改造及其心理」中所說似的，平時只爲了維持生活，戰時又在發揮其素壓抑的殺戮掠奪的預期本能，而在素質上又是流氓和無賴；如果以之作捍衛國土的有意義的戰爭，決定是難於達到預期的目的。只有強暴者們豢養着這批鷹犬，把他們作爲發展野心的工具；如此，而以升官發財爲最高理想的所謂兵士們，便可以從那發展預期本能殺掠奪的行動中實現其升官發財的理想。依據這個觀點去檢討中國全部的戰爭史，春秋戰國是那樣的，三國時也是那樣，民國成立後若干年軍閥割據的局面下更是那樣。這等兵士們之與人民對立和隔絕，乃是必然的事。

有這種壞的思想，造成了過去中國軍隊的腐化。即建立新軍的人抱着澄清的決心，但兵士在社會上的地位終沒有辦法提高起來；而前來應募的兵士，始終是家庭和社會的揆棄者，正好像他們是只能用來造釘子的壞鐵似的。原因自然是爲了王道與和平思想的影響，始終僅把軍隊當作一種特殊組織，除了卸用打戰以爭城奪地外，似乎別的便毫無用處。直到如今，政府企圖以徵兵來提高兵底素質之際，社會上流行的「兵役規避」，大半的原因還是由於對「兵士」身份的不恥。我們如果要運用具有良好素質的兵士以抵抗侵略者，社會對兵士的鄙棄心理是亟應根絕的。

(一) 太平軍與中國兵素質之改變

在太平天國以前，中國兵士的腐化是無可諱言的。在洪秀全起兵之後，因爲滿清蒙養的兵士之無能，以致太平軍掩有六省之大；如果不是阻於黃河的崩潰，早已是直搗北京而傾覆了清廷。

滿清因爲防長漢人的反叛，在軍隊方面是以「旗兵」爲主，目的並不是在具了甚麼「

國防」的意義，而分成各省以鎮壓漢人，倒是他的第一主義。因之，「旗兵」的兵員成了世襲，他們因為這開國有功的世襲，逐漸形成了「旗兵」的腐敗；他們雖是「皇軍」，實際上也不過爲了「論功行賞」，除了藉赫赫的威儀以震懾漢人外，說不上甚麼實質。至於用兵餉招募來的「綠營」，這些漢人也無非想以「當兵」作職業，作爲解決生活困難的一個途徑。他們與旗兵似的，弄得暮氣深重；根本上說不上甚麼戰鬥能力。正如曾國藩在應求直言詔奏中所說：「漳泉悍吏，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人以邀功。」如此，這批兵卒們早喪失了戰鬥的力量，實際上成了平亂則力不足，擾民綽然有餘的狀態。因之，在滿清的正規軍征討太平天國的所謂「賊匪」時，兵卒們之無戰鬥精神，早已是由來已久的事實。

滿清「皇軍」既是如此的腐敗，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期望，在他們是難於實現的。這話，在太平天國起事後便獲得了一個確切的證明。

太平軍起於滿清極度壓迫，農民生活異常痛苦之時，明白的說，太平軍便是農民的暴

動。牠利用耶穌教爲掩飾而掀起驚天動地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第一個以「宗教」爲號召而比較成功的人。爲首的洪秀全自立爲「天王」，摭拾了基督教經典中的片斷思想創立了一種反映當時國家和人民之特質的制度。雖然有識的外國教士們只認爲是基督教中的一種異端，但是在他的教義裏却包含有一切宗教的成分，具有一種足夠鼓舞起人們的理想，使感受着教義洗禮的人隨時犧牲性命完成崇高的價值。——尤其是感染他的教義的「志願兵」們，並不會辨識教義的是否雜醇，仍然下意識地深受牠的感動，不僅個人是如此，而且在整個軍隊中，使每個士兵都被引到最偉大的英勇行爲去。

在洪秀全起事時，所謂中國的兵士們，不管是召募或徵集，都是以「兵餉」作第一主義的；兵士們僅以「兵餉」的厚薄作爲效忠程度的標準，大家在「重祿重賞」的條件下被吸引着，精神的紐繫是極爲薄弱。直到太平軍勢力的崛起，因爲兵士全是志願的，故能祛除管仲所強調的「重祿重賞」原則，第一次從精神的理想方面對士兵個人加入訓練。以有精神訓練的志願兵與純以兵餉紐繫的清朝募兵們對壘；宜乎太平軍是所戰皆克，能掩有滿清天下三分之二。

太平軍的志願兵底精神和思想訓練，在今日看來，頗足以加強建立新軍的意識，從而積極的改造兵的素質。而對於當日的滿清皇軍，仍然沒有新的改進；即是在討伐太平軍時新起的楚勇，湘勇，淮勇，也並不曾注重於精神思想的訓練。結果，三省義勇的腐敗，不得不被北洋新軍的建立所淘汰了。（北洋新軍是以喬化了的淮勇幹部作基本。）

（三）國難與中國兵素質之嬗變

中國兵士過去不僅在本國人的眼中視作「壞鉄」一類的東西。而外國人也因罵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的關係，更把中國兵士看成有害無益的東西。這一切是由於數千年來對兵士的傳統歧視之所致，從而決定了兵的素質；他們在精神上沒有接受過甚麼訓練，便只有像鷹犬似的被其主人豢養着。

細考我國的兵制，可以說自黃帝以來算是兵制漸舉而器械漸備，在適用上也漸獲得了正途。以後兵制是採取的「寓兵於農」的農兵方法。直到周末戰國的時候，因為諸侯各自企圖稱霸，釀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現象；井田之制廢後，徵兵

無從根據，於是廢棄徵兵而爲多量的募兵以雄厚其勢力，這種「傭徒鬻賣」的方法，造成了戰國混亂的現象。而一國兵員的數目常至數十萬之衆，如果把六國統算起來，數目不下千數百萬。如果仍然施行周朝徵兵制的制度，又怎能有如此衆多的常備兵員？秦始皇之能吞併六國，兵力之強可說是其成功的大原因。他因爲兵不足用，在徵調兵士方面，開展了兵之來源的新紀錄。在感覺正規軍不足之外。遂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宮徒刑者以及嘗有市籍者，又其次是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他如此的慘酷，以及兵員素質的複雜，因此在發卒未畢時，由揭竿而起的謫卒所釀起的叛亂，終于不可收拾；秦始皇所謂的萬世天下，便由此斷送了。漢武帝以後，也是像始皇似的，毀壞漢初徵調的良法，而至選募罪徒以充郡國之兵。選募的份子屬于勇敢，奔命，伉健，豪吏，應募；徵調的罪徒包括謫民，惡少，亡命，徒，犯刑，罪人等，兵的素質也是極爲複雜。至于東漢，地方的兵完全出于召募，漢初寓兵于農的法廢後，那國轉無可恃之兵了，而東漢的所以召亡，便是在這種原因。再降而至晉朝，因爲每有征伐，輒發「僮奴」充當兵役，以後或以義隨與實戶等充當兵役，使皇皇的制兵全成了「僮奴」的隊伍。兵制之壞

沒有比此更甚的，而兵的素質之差更不待言了。隋唐的府兵制雖然很有寓兵于農的古意，但是在唐高宗以後，因為久不用兵而府兵法制不守，軍士只有以召募行之，往日更代番休的辦法便廢弛了；由是，外而各方鎮擁有龐大的專兵，制減中央的權力，內而甚至宦官也能擁乘自豪，可以隨時競相召募。在如此情形之下，市井小人也充軍役，不管他的素質是否良惡；馴至內外交亂，唐室覆沒，都是緣于兵之素質的影響。

府衛之兵廢後，召募之制便代之而興了。以素質上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籍國內良民以討有罪，故牠的素質較良；而召募之兵是收國內曠悍之兵以衛良民，其素質之不良，與其行為之卑劣，自不待言。然而君主們終因由亡命之徒組成的「募兵」隊伍較之「農兵」更爲「務實」而效忠，故不惜趨之若鶩，視作奪取政權及保障生存的唯一工具。

在唐亡後，代之而興的宋朝，在開國之初便採用召募的方法。開始召募時，度人材，閱走驢，試贖視，然後爲贖面，賜以緞錢衣履而募諸軍。而召募的來源也不是取于一途；或土人就所在團立，或以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飢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因此凡是國內失職曠悍的人，都全數收而爲兵了。在國家無事時，食俸廩，備征討；一旦

有警急，勇者力戰鬥，弱者給漕餉（平時僥倖者使之擔任京師禁衛，短弱者留作本城廂軍）。可是到了宋朝南渡之後，募兵的制度沒有變革，兵更不能用；因為當時應募的不是游手無籍之流，便是負罪亡命之輩。在國家承平時，紀綱立，威令行，却還能驅之入疆場而期其必勝；然在國家多故的時候，便不是這種素質不良的人們所能勝事。更是，南宋立國所恃的也只有東南柔脆之民，宋朝之不能抗拒南下的胡騎而趨於滅亡自是意中事了。

在滿清統治時期的兵卒，除了「旗兵」被卸用作鎮壓漢人的工具外，對於兵士個人的訓練，仍然是與過去的每一個君主們一樣的，只是在餒餒一批足以飛鷹犬之能事的兵卒。他們的素質，恰如譚熙齡在府志中所說似的：「兵不經戰，聞風聲則提攜奔走，臨敵陣則畏縮不前。而用兵諸將又苦事權不一，貪功嫉能，文員所招募壯勇，類皆市井無賴，不知紀律，不受約束，肆意搶掠。百姓畏兵，甚乎畏賊。」這因為兵的素質本來便不好，而且餉額大小；再加以平日缺額甚多，營官侵蝕餉額，兵士又不切實操練，故一到戰時，便隨地報募。驅之作戰；以如此無靈無胆之兵，不說要他們抵抗初期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即是抗拒不願死亡的太平軍，也是不能保其土崩魚潰。

直到曾國藩等起而討太平軍，才第一次以兵的素質與訓練為主。左宗棠的兵，只經二月的訓練便成爲精兵，而在素質與訓練的方法上是有大關係的。

曾國藩的湘勇並不是好了不得的天兵，不過湖南西南山勢蜿蜒，土瘠民貧，人民體壯多力，勇于戰鬥，召而練之，易成精兵。可是，時日既久，也漸習染了綠營習氣，直到剿捻匪時，曾國藩自己也說募氣太重，不能再用。淮軍是由淮北習見戰鬥，膽氣雄壯的團練而成，牠雖然因爲常勝軍的關係，器械精利甲于全國，但左宗棠後來稱其「冗雜廢佚」，其實質上染有不良習氣，以及缺乏精神訓練是可想而知的。

歷史告訴我們，雖然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的楚勇，湘勇，淮勇在旗兵與綠營敗北之後建立了不少功績；但是，他們對於義勇的訓練仍然是蹈襲了傳統的軌跡，仍然脫不了象養的老套；故在楚勇與湘勇腐化之後又免不了有淮勇與北洋新軍的建立。

所謂北洋新軍的建立，可以說是中國軍事上接觸西洋科學精神後第一次的改革，也可以說是中國新舊軍的第一個分野。如果沒有帝國主義者的侵凌，中國軍事的建立恐沒有如此之快。

中國每一次軍事上的改進，都與外來的侵畧有關。在鴉片戰爭時，清朝的官吏缺乏已知彼的打量，只知道擺出「天朝」的架子，夜郎自大。當日英國海陸軍在華勢力計有軍艦十六，大砲五百四十尊，武裝汽船四，運輸船二十七，陸軍四千人；而且軍艦高大，兵士又各有快槍。可是，當日中國的軍器，簡直是不能相提並論，砲是百年前的舊式鐵管，笨重異常；陸軍有的只是弓，矢，長戟，刀，劍，藤牌，鳥槍，扛砲等，守舊的兵士們習慣了以弓矢爲利器，因恐不慎而使火藥爆炸，連極粗劣的鳥槍也不願樂用。更是將校缺乏軍事知識，兵士又無嚴格訓練，再使用着如此惡劣的器械去對付敵人的新式利器，其勝敗不言可知。雖然朝野上下會因這次戰爭而感受了一些刺激，但直至英法聯軍之役時，對外的自大心理仍然沒有變更，以致敗喪而找不出真正的癥結所在。不說要這些兵卒們去抵禦外侮，卽是以之與「不願死亡」的太平軍對壘，也是節節敗退；如果沒有曾國藩等義勇的代興，清室早在中葉時便被太平軍所覆滅了。

可是，這批所謂中興名臣如曾國藩之輩，雖明知幫助平亂的常勝軍的戰守攻具是天下無敵的，但不能遽然冒險採用着「外夷」的器械。只有李鴻章因習見之故，才建立了堅固的

信仰；他統率的淮軍部將聶士成之能成爲中國第一次用西法訓練的勁旅，完全是受了這種影響。可是李鴻章對於新軍的訓練也是不澈底的，對於僱用的德國教練官，只給與虛名而不給予「實權」。如此，淮軍只在感受常勝軍的影響後，購用洋槍利炮，以爲裝具，西洋精神却並未學到。又兼人數不多，綱紀廢弛，直到中日戰爭爆發之時，所謂「尙堪一戰」的李鴻章的新式陸軍，也因諸將無勇氣，與指揮無方，兵士無紀律與戰鬥意識之缺乏，不能力戰而致損失奇重。李鴻章二十餘年苦心所練的精兵，在中日戰爭中如此輕易的敗北，不但是他自己不曾想到，即是日本方面也不是始料所及。腐敗而使用舊式兵器的旗兵與綠營，更不是日本的敵手。而海軍方面也因將佐不能合作，戰鬥力缺乏，抗拒不過將士勇敢，操練有素，臨危不驚，發砲命中的日本海軍。誇大的清廷自經過這次的慘敗後，才知海陸軍不值一戰，銳意裁減綠營，招募新兵，購買外械，增厚餉糈；不過在事實上固守舊份子之牽制，缺乏澈底，與統一的計劃，直到義和團之役，中國兵士還有不少是用弓矢刀矛去抵禦別人的新式武器。這些都是兵士的素質未變而又缺乏精神訓練所致，宜乎牠不能禦外侮。甚而到了滿清末年，牠連鎮壓各省起義的民軍的力量都沒有，有不少便在危急時倒戈

相向了。

辛亥革命的民軍的成功，似乎是應歸於「扶漢滅滿」的思想，但是仔細的考察起來，參與革命的民軍們，至多也只能在腦中浮着極幼稚的朦朧印象；他們之所以起來參加「反滿」的革命工作，僅是像過去若干次農民暴動似的，還不免以升官發財，企圖實現其掠奪燒殺的預期報復心理為主。故兵猶是原有的兵，而在素質上全無改進。

試一廻溯民國成立後成爲大問題的所謂「裁兵運動」實成了當日最難解決的問題。因爲每一個所謂革命領袖所統率的兵士，不管他是反正的綠營和新起的義勇，他們都會替革命多少盡了點力，如果要徹底地裁撤，不但以開國功績自命的將士們不易處置，即是一般所謂擁兵的統帶們，也想藉武力以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在必要時作爲生存的工具。

因之，在民國肇造後的二十年間，擁兵自豪的軍人之多，以及常備兵員至三百萬之多，除了春秋戰國外再沒有可與倫比的；而這些兵士的素質，也和春秋戰國時代的兵一樣，只有時代的不同，而在實際上也純然是野心家爭城奪地的工具。

從上述的一切看來，兵的一切不免使人發生恐怖，無怪乎十餘年前大家倡議着廢督而

裁兵的運動。不過兵的職責原是在「衛國衛民」，而他們之所以弄到「禍國殃民」的地步，是運用者不得其宜，並不是所謂「兵」也者有如何的偉力。像上述太平軍的兵之素質及其兵制，雖僅以烏合之衆，却能席卷清朝三分之二的天下。原因是由於：一方有好的素質，思想的維繫，戰鬥的意識；而一方只是以餒餒爲主，因腐敗而敗北自屬必然。因之，我們今日在追述太平軍以思想訓練兵士之餘，對於自發生國難以來在兵士訓練之失策，不能不感覺喟嘆，如果在鴉片戰爭後便注意及此，不會有中日戰爭時之慘敗；如果中日戰爭後在軍事上能有銳意的改進，決不至形成義和團的荒誕思想，替中國軍人留下恥辱。給全體國民帶上賠款的經濟枷鎖；而且，如果在北伐之後，軍人的素質便有普遍的改變，也決不會在九一八事變之際，在一夜中失掉了三省錦繡的河山。然而「多難興邦」，在帝國主義者高度的壓迫下，正是一副強烈的奮劑。像美國「太平洋關係學會的會刊」曾說過似的：「最近一年來更加顯然，日本在亞洲大陸侵略的主要成功之一，就是促進中國的統一和鞏固……無論甚麼也不能像日本的壓迫所引起的民族自衛問題的緊張這樣加速這個過程的。」不然，中國的軍閥和政客們仍然不會犧牲割據的思想，而在一個政府領導之下精

誠團結起來，鞏固民族國家的基礎；即使外來的壓力會引起「民族自衛」意識的昂揚，然而過程是相當的長，不會像過去事實上所表現的那樣迅快。而且，在這個加速的過程間，因為民族自衛意識的昂揚，在淞滬迸發了一二八抗戰，作了東方睡獅的第一吼聲；繼之又有了長城的抗戰，使日本歸於大刀的威風而寒了胆，在一九三六年又作出了綏遠的英勇抗戰；在一九三六年的七八月又有盧溝橋和上海抗戰；到今日，更因敵人的侵略而在冀，晉，魯，蘇，浙，皖展開了英勇壯烈的全面戰。而且爲了這「獨立的民族自衛」，使沉睡了若干年，飽受了欺凌的所謂「睡獅」第一次發出了搖撼世界的咆哮；使病入膏肓的所謂「東亞病夫」，從奄奄一息中奮起而拿着武器與敵搏鬥；爲了強寇的侵略，齊了一全國參差差的步伐，凝固了散沙似的人心。這一切都是若干年來努力而不能實現的，今日又怎能在短期內趨於實現呢？明白地說：「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侵略中國的結果！」不然，睡獅的沉睡還不會醒，病夫還睡在床上等死，分崩離析的人心也還是像一盤散沙。這樣，我們應該感謝侵略者的禮物，他促成了我們英勇的抵抗。

這一些英勇而壯烈的偉績，都是由那素爲人所不恥的所謂「壞鐵」們的頭顱與熱血鑄

成的；在抗戰的前夜，千萬被人不齒，或許會做過軍閥們鷹犬的兵士，爲了一朝的抗戰，頓然洗刷了數千來軍人的恥辱，頓時改換了若干年來不能解決的素質問題。——即是說：中國今日的軍人，已由軍閥豢養的階段走到國家化的階段，兵的素質也因民族自衛底意識之昂揚而有了意外的改進，加速了演進的過程。如果不是由於國難的嚴重，對外同仇敵愾心的激昂，恐怕經過若干年在精神上的努力，而在素質上也不會因徵兵的逐漸施行而能臻於今日的地步呢。

第五章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一)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二) 軍人抗戰精神的偉大支持者

(三) 戰鬥性與地理環境的影響

(a) 北方的尚武與豪俠

(b) 南方軍人的戰鬥力

(c) 飲食給與南北軍人的影響

(d) 地方移民對於南方民族的影響

(四) 黃埔精神與廬山精神

(五) 中國軍人的進步

第五章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一) 中國軍人的戰鬥性

如果以儒家的非戰，墨家的非攻，老子的「無為而治」等思想來推測或論斷中國軍人的鬭爭情緒，不啻是難於成立的。歷史上雖有上述傳統思想的薰陶，然而在事實上，中國軍人却是當於鬭爭情緒，在外侮來時還是極富於抵抗性的。

孔子主張治國之道在足食足兵，在不得已而去時才主張去兵，並不會絕對廢兵；反之，他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却成了中國歷代抗拒外侮的傳統教養。如果說，今日的民族主義是孕育於此，也並不是過論罷。——因之，在今日由於嚴夷夏之防的訓示，中國人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懷着很強烈的種族仇恨，從這種仇恨，使中國方面形成了最優良的鬥爭士氣。

中國軍人之富於抵抗性，在這一次全面抗戰中，由事實上的表現，不僅引起輕視者的驚訝，即是國際的有識之士，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因為中國在其悠遠的歷史中，我們刻苦的祖先曾遭受過許多外敵的侵畧，但始終還能生存的原因，是因中華民族偉大的毅力曾經征服過最惡劣的環境和條件。否則，如果沒有對外的抗拒力，我們不能從寒帶到溫帶（熱帶），在許多不同的地域下忍苦耐勞。在今日不僅是生存，而且還能繁榮昌衍，正在艱厄中展開劃新時代的一頁。

據美國紐約時報上所載的中國作家林語堂的意見，認為中國兵士的戰鬥性是和日本的不相同。本質的說，中國正像英美二國的陸軍似的，全是帶着笑容在作戰，而是隨機應變的人。因為你儘可以使用法國槍上的刺刀，或德國槍上的刺刀，或中國的大刀去戳傷一個人的肋骨，那殺人時候的心理總是一樣的。這種為軍事觀察家們所承認的中國兵士之戰鬥性，他認為正是神聖抗戰的支持者，即使不設防的城市遭受了敵機的轟炸，但精神上的勝利仍然是屬於中國的。拔非（N. Pether）也會在該報上把中日兵士的心理作過一度比較，他認為日本人并不是情願上戰場，而是不得不上戰場；而中國人却有些兩樣，他們是願意

戰爭的；雖然戰爭就是死亡，就是毀滅，但是不戰却更壞，不戰就是投降日本。也即是說，中日兩國人民的心理可以一言之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自上而下的，在上者煽動，在下者服從；中國對日本的戰爭是自下而上的，在下者督促在上者執行。不錯，像拔非所透視的，正是中國今日的實情，因為自從九一八以來，國民便隨時要求政府立刻對日宣戰，而政府一直容忍到和平絕望的最后關頭時，才決定犧牲以圖存。

中國軍人之富於戰鬥性與抵抗性，正像亨遜氏（Hansen）根據於研究中國兵士戰鬥力有年的美國著名軍事專家的意見，認為「只要有所為而戰」，中國的兵士是具有極堅毅而勇敢的，能刻苦耐勞的靈巧的美質；在他有把握抵抗外敵的時候，都是勇往直前，而且沒有後退的。

不錯，我們在看了外人的透視，覺得在今日的全面民族自衛戰中，雖要在目前南京已行淪陷，雖然敵人正企圖建立傀儡政府以代替抗日的國民政府，但是上面所述的中國兵士底美質，從南北戰場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是永遠不會磨滅的；而且他們將永遠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為民族的獨立戰爭拋灑至最後的一滴血。

(二) 軍人抗戰精神的偉大支持者

在過去，中國民衆正像非戰的先賢在文獻中所訓教似的，對戰爭總是加以極端的厭惡。更加民國以來的內戰，當是直接給予民衆以痛苦；所謂派款，拉伕，徵糧，以及騷擾，踐踏農作物等，都是民衆所不能忘記的切身痛苦。這樣，他們既對戰爭予以厭惡，而對直接執行戰爭諸暴行的兵士，更是恨入骨髓。以這種軍閥鷹犬似的兵，而又要使之爲國爲民，而要獲得民衆的支持，那是萬不可能的。

自然紛擾的中國現在也不過恰邁着她的「初步」，一切的一切原用不着刻薄的批評，可是，在抗日的全面戰展開後，表現出的民族抗戰精神之偉大，並不是言語文辭所能形容的。

英國孟却斯特導報駐華記者丁卜萊 (M. G. Timperley) 對於中國人此次對日的抗戰情緒，認爲是正和世界大戰時的歐洲人民一樣，人人都滿着抗戰的精神，大家團結一致做政府的後盾，使侵略者付最大的代價來換取一尺一寸的中國土地。因此，他認定日人不是在

向一羣軍事領袖作戰，而是在向一個忍無可忍，不怕任何犧牲決心抗戰到底的民族作戰。

在抗戰中既有了這樣堅固團結，抱有犧牲決心，而又有龐大人口的民衆，和忠勇軍人的抗戰，可說是獲得了堅強有力的「支持」。中國軍人大都來自鄉村，此次抗戰中民衆在糧秣上踴躍的供應，無異是在接濟他們自己的弟兄；年輕的青年童子軍不畏艱難的分頭努力於救護傷兵，無異是以救護的工作補償了他們企圖殺敵的敵愾心；甚至平日沉迷逸樂的小姐太太，以及紙醉金迷的舞女，拍賣肉體的妓女們，都挺身而出爲受傷的將士服務。民衆所表現的這種熱誠和服務的精神，「支持」了中國軍人的抗戰精神，在每個將士的血液

中，注入了偉大的興奮劑。——在二八淞滬抗戰時，上海市民所表現的後援工作只是一方面的，此次義勇的市民却荷槍實彈來參與保衛大上海的運動。在過去的戰爭，人民是兵士們後方的敵人，今日却成了前線的同伴，爲忠勇的將士們担任運輸，情報，構築工事，燒飯洗衣救護。此種軍民合作的精神，邁過了牠應經過的程序，勝過了若干年文化教養的力量。

更是爲了日本若干次對非戰鬥員和不設防城市的轟炸，表面似乎破壞了國民的生活

，而有釀成「恐日病」的可能，然而，在事實上反激發了民衆抗戰的堅決心志。一批一的戰士爲國犧牲後，後繼者的抗戰情緒較之前仆者更是加強。

(三) 戰鬥性與地理環境的影響

(a) 北方的尚武與豪俠

中國軍人的地方性，如果以事實來說，未始沒有多大的關係；而且可以從歷史上找出不少的證據。在近代，不但中國人有同樣的感覺，甚至東西洋人士，也在這方面有透闢的論見。

在古代，燕趙是被稱作多悲歌慷慨之士的。我們知道燕趙的轄境是時有變遷的，並不僅局限于河北，山西，及河南。這些地方所以能產生悲歌慷慨之士的原因，我想是源於客觀環境的形成。當日的所謂燕趙可說是中國對外夷的國防最前綫，以遊牧爲生活的外夷及胡人等，而隨時都有向中國侵略的危險。所以當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會傳爲佳話，而各國繼之仿效，對於以後北方健兒的勇敢尚武，可以說是有不少的影響。因之，在數千年來

，北方各省都以尚武著稱，乃至宋朝北方豪家的興起，未始不是受燕趙與胡人及外族侵凌的影響。

我們再從歷史上考察，古代的軍事家都是出在北方，如大公望是呂人，孫武是齊人，龐涓是魏人，白起是岐州人，吳起是衛人，近古的岳飛是河南湯陰人。爲了兵法家都是出自北部，兼以北方較南方開化爲早，也許便是歷代北人在軍事上征服南人，（外族侵略中國的事實更是衆多。）而在政治上統治南人的關係。數千年來以南人統治北人的，恐怕只有明朝的朱元璋是值得稱道的。只要稍一考察，此風直至清季民初，還是沒有如何鉅大的變更。

（b）南方軍人的戰鬥力

在有清中葉，爲了太平天國的崛起，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之興起，以北方軍人而担負起全國重任的局勢，此風才稍有變易。但至民初以至北伐以前，竊據軍政要津以統治中國的，還是以北方人佔多數。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及北伐之所以發生，可說是南人對北人統治的一種必然的反動；也即是說，正是兩粵兩湖及川滇精神爲其原動力。直

到全面抗戰的今日，其情勢還是如此。

現任香港大學教育學教授的英人佛思特 (Lancelot Forster) 在他所著的「中國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 一書中也曾論到廣東人的精神，認為廣東人因最先接近西洋文化的關係，由於海洋的感應，更增益了冒險的精神。因此他們很不注意於「後顧」，而只是注意于「前膽」；與其說是一個牧師，無寧說是一個預言家，與其說是傳統的保持者。無寧說是一個激烈份子和革命家。

曾在中國居留十一年的日本南京總領事須磨，三年前返國後在發表的談話和講演中，認為支持今日中國走上復興之途的是「廣東精神」。

他認為在「中國不可動的自力更生的實情中」，不可忽視的是「廣東精神」。他說：「中國現在雖然已經不公開的講排日，但一般救國的言論却實包藏着極深極強的反抗侵略者日本的意思。這同當初革命精神大燃燒時代，對抗日本的敵愾心，翕然滔滔于全民，我對這點會深作精神的解剖，我概括的把此種中國的精神，叫作「廣東的精神」。這種燒着進步統一而矢志恢復主權之熱念的廣東精神，如離中國而去，則中國祇有鴉片，享樂

，和賭博。

「廣東精神即是以廣東廣西爲中心，在西南的天地中所育長的中國統一運動，起着中國統一的作用，而奏效結實的。一二八上海抗戰，陳銘樞蔡廷楷所率領的十九路軍的抗日，也是廣東精神的表現。……」

他之所謂「廣東精神」，也可以說是「客家精神」的表現。因爲十九路軍之所以能抗日，由於十九路軍的將領和士兵大多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六期時代在中國北部漢族中最精悍勞働的一羣。他們因爲反抗當時的爲政者，以致被放逐到了西南；過了千餘年被虐待的生活，在以兩廣爲中心，成爲西南六省數千萬的大民族，到了今日蔚然而爲「廣東精神」，仍然保持着當日精悍，勞動，反抗的精神。

他更是認爲蔣介石先生之能成爲統一現代中國的巨人，也與廣東精神有關。主要的是以黃埔軍官學校爲主幹，而黃埔就是最早在廣東接受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即是說，孫中山先生在革命的途中，以廣東精神發動中國民族革命，而蔣介石先生是本着他的革命精神，更揚揚而光大之，企圖完成民族復興的偉業。

自然，日本人的所謂廣東精神，免不了帶有以地方性來割裂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可是事實是鉄的例證，用不着我們來作無味的批駁。所謂「廣東精神」，可以說便是中國人反抗精神的一種具象化；辛亥革命是此種精神，北伐更是此種精神，抗戰也許還是此種精神的擴展。不過，我們不應拘囿于廣東二字，把地方性的色彩來抹殺了牠廣泛的意義；因之，爲了歷史上的相承，凡是具有革命性，抗戰精神的表現，都可以名之「廣東精神」。（此種認定本嫌牽強，但我是希望抗戰的精神能在全面抗戰中作多方面的表現。）

（c）飲食給與南北軍人的影響

北方民族的爽直慷慨，對於飲食上常有關係。比如說：地方人喜食大蒜，所以他們的性格常是爽直而痛快。（張君俊在其中華民族之改造一書中也有此種認定。）又因北方的畜牧事業較南方發達，營養品大多取于富有構造骨骼的鈣質與磷質的肉食及飲料，再加以麵食的關係，故其身體多魁梧雄偉，體力足以使他們成爲好戰善鬥。

在南方民族中，最富於犧牲精神的，第一要算是兩粵及兩湖，其次才算是川滇黔三省。兩粵方面除了上述的客家精神外，因爲移民關係，他至小還影響到湖南，貴州，雲南，

和四川。(四川的廣東兩湖移民不少，尤以舊湖廣省麻城人爲多。)如果從食品上說，也正如前述的北方民族與飲食似的，正有着可靠的實例。因爲這些地方的人並不像喜食糖的江浙(江蘇北部近于北方人性格)人的柔弱而狡猾。湘蜀人喜食辣椒很影響于他們的性格，使他們易怒，亢直，富于冒險性，革命性及戰鬥性。兩廣人喜吃蛇，貓，鼠及其他奇怪東西，因而構成他們冒險及革命的精神。像廣東的所謂械鬥，是爲他省所罕見，甚至他們僑居國外，也還是不能革除此種壞的習慣。因之，如果移此種私鬥精神而爲國家民族，他們的力量是難于抵禦的。同樣，往日忙于內戰的川軍，今日也還能一變而爲抗日的勁旅。

(d) 北方移民對於南方民族的影響

然而南方民族的能抵抗能戰鬥，對於北方優秀份子的移民是很有關係的。「中華民族之改造」的作者張君俊也是如此的主張。他們爲外侮，飢荒，水災，亡國等原因，不得不向南方遷移。——尤其是換朝代時的所謂「亡國」。

既有了上述的關係，所以歷代的革命或民族復興的根據地方都是在南方。由此移民的影響，那些遺留在北方的都是馴服良民，很適合於統治階級的目的；時日既久，形成了後

日北方人的「尙保守性」。反之，移居於南方的大部是具有反叛性（革命性）的份子，由於他們的影響構成了南人的冒險性及尙進取。我們只要從祖逖，陶侃，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朱元璋，顧亭林，洪秀全檢討至辛亥革命，便可知上面的觀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四）黃埔精神與廬山精神

論史記文辭人的常說，太史公隱遊名山大川，故爲文而具有奇氣。因爲他生於龍門，幼時感染了龍門的峭拔雄偉，二十以後又南遊江淮。如果常人所說「山川靈氣」一語是有相當至理，也可應用來衡量建立新軍以復興民族的蔣委員長之一切。

他的故鄉是奉化。奉化有很多名勝，到現在也很可使他回想到以往。奉化的週圍，是山海，西南有一個雪竇寺，巍然屹立在連山最高頂上。寺的附近，又突起許多的山峯峭石，好似環繞着的羅漢與和尚。西南的「千丈岩」是瀑布的名勝地。那種萬馬飛奔的壯觀，遠勝過日光華嚴瀉的那種澎湃聲勢。只要春夏身臨其境的人，觀着葱蘢的草木，鳥語花香，山間的林泉，山上寺裏的晚鐘晚鐘，沒有誰不認爲是桃源仙境。在這環境中產生出來

的人物，應該是怎樣高尚而偉大的人物呀！

據「蔣介石傳」的作者石丸藤太的推斷說：「蔣介石氏的那樣富於睿智的眼睛，或許就在這種優美的山水裏面育成的罷？假如我們以奇峯來象徵他的果斷力，那麼他的奮鬥進取的精神，應該是因爲受了千丈岩的薰陶罷？他在少年時候，朝夕眺望的連山最高峯的雪竇寺的雄姿，怎不就是造成他今日所以能做四萬萬人的「民族英雄」的那種綜合的政治能力，達觀，以及悟性呢？」

而且他訓練軍事政治的幹部，也常是與山川名勝有關。——也許可以說是：企圖藉山川的偉壯來鼓舞士氣；只要從黃埔島，廬山，洛陽，峨眉山等地來觀察，便不難獲得一個有力的證明。

國民革命的新軍底幹部是由黃埔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黃埔學校是在珠江口羣島的一個小島上，後面負山，校門外便可望見浩瀚的港灣，港灣外便接連着茫茫的碧海，從波浪環繞的小島上孕着出來的學生，宜乎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蔣先生初試鋒鏘，領着以五百爲幹部中心的學生，（據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訓詞）外加許崇智兵三萬，巡警三千，

對抗着陳炯明的八萬軍隊。明清以來未曾失陷過的名城惠州，終於因為精神克服了武器而格落了。再試鋒鏖，又一鼓掃蕩了吳佩孚孫傳芳盤踞在鄂贛的大軍，而克服了武漢和南京。繼後爲龍潭與汀泗橋的血戰，乃至北伐的完成，都充分發揚了黃埔學生犧牲的精神。否則沒有磅礴的士氣，沒有爲主義而犧牲的精神，沒有海嘯似的魄力，單以北伐軍器械的窳敗，兵力的單薄，又何能在敵我懸殊的情勢獲得勝利完成第一期革命呢？日本著作家澤田稱贊黃埔學校的精神說：「黃埔學校中由蔣介石訓練出來的青年軍官，和那些反覆無常的軍人不同，變成了爲主義不怕死的勇敢戰士了。」北伐之所以能殲孫吳等軍閥的勢力，都是這種精神的昂揚，而以革命的精神戰勝了敵方銳利的武器！

第一期革命完成後，正如蔣先生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開學訓詞內所說：「從前總理所傳統下來授給我們的革命精神，我們已漸漸的喪失完了。因此要蒙受現在喪師失地，分崩離折的莫大恥辱。我們大家如果自認是一個革命軍人，那就要對於一般死者，更要特別負起革命責任。不但使革命精神復活，而且要使中華民族，要由我們廬山軍官團復興起來。」明白的說，黃埔軍校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責任，而廬山的使命是要完成第二

期的革命責任。——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再來收復失地，完成安內攘外的大二期革命的責任。

而且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地址又是在廬山南面五老峯海會寺的一帶。廬山以往只認為是仙山或有間階級避暑的地方，誰又會想到會在軍事訓練方面含有偉大的意義？然而經過蔣先生的慧眼，荒涼的山野，頓時變成了悲壯的營地。

軍訓團選的是星子縣境內海會寺山腰一帶的地方。海會寺本是五老峯下一個小小的廟宇，除了有間遶南山的人去看一看血書的金剛經外，在遊人的心中也沒有幾深的印象。然而，如今選定了那附近的地帶練兵，又的確有很深厚的意義：上有高聳而峭拔的五老峯，它突兀嶙峋的五峯和毗連的羣峯，雖不及漢陽峯之高，而峭拔兀突的形狀，正好作為第二期革命軍訓的象徵。而且面對着浩漢的鄱陽湖，每晨觀着由湖中昇起的旭日，也正好象徵中華民族無量的前途。（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前，日本川越大使回國後曾警告朝野說：中國如太陽之初昇，日本如日之沒落。）在這種地理環境裏，而又從蔣先生精神教育中，日夕薰陶出來的軍事政治人才，宜乎氣魄雄偉，毅然地擔負起第二革命的重任了。

星子的鄱陽湖本來是周瑜與曾文正部將玉麟彭棟水兵的地方然而有了海會寺的軍訓，更可以看出牠的偉大意義。——第二期革命精神的表現。

當日廬山軍訓是主要的目的爲了「剿匪」，如果要在短期內殲滅盤踞廬山峻嶺以負隅抵抗的共產黨，「爬山」與「耐苦」是必須具有的技术和精神。有了突兀峭拔的五老峯可爬，和由山脚到山頂上食飯與大小便，及其他特種爬山的訓練，才可以達到進剿與追剿的目的。當日蔣先生在剿匪部隊訓練要旨中所強調的，第一項便是爬山的訓練。訓練的程序是這樣的：「凡令練習爬山之部隊，起初不帶行李與武裝，祇須練習徒手攀登。第一星期至少練習三次，第二星期至少演習四次，依時增加，經過二星期相當演習期後，即令其隨帶行李武裝，並逐漸增加其重量……。」這樣，爬山的技術自然可以逐漸趨於純熟了。

在當時，爬山的訓練是爲了「剿匪」，即是在後來一二年，康澤先生主持的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雖然仍是第二期革命的訓練，但爲了臨近星子的五老峯的原故，對於爬山的訓練，還是不曾放鬆過。那無路可達的突兀而峭拔的五老峯，該班爲了鍛鍊官佐員生的體格及爬山技術起見，每半年必定要由主官率領數千人強迫的攀登一次，那浩浩蕩蕩的長蛇

陣，單是從照片上看來，也就是一幅壯麗的圖畫。

其次再說到洛陽和峨眉山。洛陽是中華民族發祥地黃河的一個名城。從前洛陽被認為居天下之中，從周朝以至後代，都成為中國文物上的要地。若要尋覓古代的文化遺產，在洛陽一帶是蘊藏不少。

從前吳佩孚曾在洛陽建造了一個碩大的營房專事練兵，他以後之能成為「大帥」，擁有十省地盤，左右大局，據說完全是源于洛陽的練兵。而今中央在洛陽有中央軍分校，和空軍訓練至少也是借用名都偉大的歷史性，和山川的形勢來訓練國防前線的戰士。

峨眉山是中國的仙山，是五嶽以外的高山，從「峨眉天下秀」一語中便可想見她的清秀。然而蔣先生又為甚麼選擇「秀麗」的仙山來訓練激昂慷慨的戰士呢？

景物原是死的，一切在乎人的活用。比如在廬山軍訓的中秋賞月時，蔣先生曾指示出要與部下「共甘苦」，使他們都能利用景物來陶冶性格，將那種腐敗野蠻的娛樂一概戒除，而代以新的正當娛樂，使他們能夠培養着一種向上發揚的高尚精神；而且賞月也不是像一撥騷人志士才子佳人似的。一看到月就發悲感或閨怨；看到月或就發生月圓人未圓的嗟

嘆。在一個革命軍人，看到天上月圓時，應想中國的「統一」問題。這樣，看月具有莫大的意義了。——而在峨眉山軍訓團的賞月時，更附加上了民族復興的意義了。

峨眉山儘管是天下之秀，然而寺廟的命名却比廬山雄壯得多，以雄偉見稱的廬山倒有秀山峯寺，棲賢寺，而天下秀的峨眉山反有「伏虎寺」與「報國寺」呢。

峨山軍訓的目的是偉大的。一二期調訓的川康滇黔等省區的軍政人員，數目不下一萬五千人。咄咄一時的四川軍人如楊森，劉湘，鄧錫侯劉文輝等還只當了個團附，師長如唐英等只當了個連長，餘下的排長班長，至少都是旅團長。宜乎蔣先生說：黃埔軍校是完成北伐，廬山軍訓是完成剿匪，峨眉山軍訓是要完成民族復興的偉業呢！

蔣先生當時在峨山駐節的地方是「伏虎寺」，可以說象徵着「民族領袖」的意識。軍訓員生住的是「報國寺」，象徵着這些擔任民族復興重任的戰士們底前途。——在這種精神感召下，川滇黔三省受訓的健兒們，如今大部已在全面抗戰中，在淞滬及晉，冀，魯，蘇，皖，等省担任最前線的戰鬥，作出了壯熱的犧牲，不會辜負了蔣先生的教養。

(二) 中國軍人的進步

法國詩人兼外交家克萊德曾說：「凡會由中國內經過者，無不諗知中國人秉性之明敏，及及消極抵抗力之巨大，世界各國如果一致為之聲援，其抵抗侵略者力量之偉，自更不言而喻」。他的話雖是透視到中國人的精神，但是，他不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全像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義似的，他在和平絕望之時，還具有積極抵抗的偉大：與其屈服求饒，寧可殺身成仁以全名。這是中國歷代先賢所訓示的。

這一切，在全面抗戰發生後，由軍人所鑄就的壯烈事實，是證明了積極抵抗力的偉大。正像德國國防部所認定似的：中國兵士以落後之器械抵禦倚恃機械化侵略的敵人；雖然在日本海陸空軍聯合進攻之下，兵士們抵抗的決心，絲毫不為機械武器的威力所撼動。

但是，一般素來不恥中國軍人的人不免要發生疑問：「他們究竟為了甚麼原因能表現出如此壯烈英勇的偉績呢？」我認為其他的原因雖有，而抗戰意識的激發是為其最緊要的因素。有了這種偉大的共同目標，全國的軍人不論他過去是如何的素質不良，不論他是被

某種野心家所策養，而在此次的抗戰中，却都能協力以赴的作出壯烈的成績。

尤其是在敵人利器轟擊下，在卸用漢奸政策以亡國的分化下，軍人們能在威迫利誘之下繼續抵抗；除了在抗戰陣線以外的隊伍軍閥和政客，才能靦顏去爲虎作倀，甘作敵人侵略的傀儡。所以大公報在論「中國軍人的進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文中認爲「中國軍人道德，在最近又有一重要表現，就是：暴日這樣兇殘橫暴，這樣威嚇利誘，而中國軍人中決沒有對敵人屈服之人，更沒有爲虎作倀的壞種。此次北平偽組織，敵人處心積慮，經營數月之久，但漢奸名單揭開，並沒有一個軍人在內。這雖是當然之事，但實在是中國軍人的名譽。我們看歷史，每值外患，必有不肖軍人，勾結降敵之事，現在則絕無沒有。北平醜劇中，只有些買辦式政客官僚，逢迎敵意，作無恥勾當。而以日本這樣誇骨，不能屈服一個中國軍人，這是怎樣可喜的現象呢？」該報的論評是近數年來在全國擁有大量讀者羣的，由此可知它實是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見，此種道德正是中國古代先賢以及近來建立新軍者所諄諄訓示的，不到時窮節乃見時，試鍊不出堅持之節。

該報又以爲國民要認識的，「我們軍事雖是這樣艱難，但以軍人而論，實在有重大進

步，恐怕自有歷史以來，中國的武力以今日為最強。因為軍人這樣一致愛國，這樣勇于犧牲，在歷史上實在是空前之事。這五個月的經驗，中國有敗軍而無降將，有戰鬥力脆弱或指揮不好之部隊，而絕無不奉令不應戰不犧牲之部隊。所以自消極的意義言，中國軍人的道德與精神，已達到歷史上空前優良的程度，何況多數部隊，那樣耐苦，那樣勇猛，在武器不良，接濟不好，工事不堅，交通不便，種種壞的條件之下，與暴敵那樣惡戰，那樣堅守。這以精神意志論，實在是世界各國之所不能，不只是我們歷史上之所未有。」有了這種精神，即是最後剩一寸土，一粒彈，也必會流最後一滴血而後止。

自然，這些並不能完全表現出中國軍人的進步和其優點；因為在南北戰場上的戰績上，在失利後的再接再厲上，在非純粹機械化以及交通落後，給養缺乏，待遇不良的狀態下，早已作出了中國軍人的進步和優點底實際成績，從文字上是不能表現於萬一的。（其他的進步和優點，分別在前後各章中敘述。）然而，無可諱言的，在軍事上我們也表現不少的缺點，如像關於指揮，戰略，與政治訓練都有在不利的戰爭後積極加以改進的必要；如此，才能保持軍人以往在抗戰中的榮譽，才能求得全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第六章 中國空軍的戰績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二) 飛將軍的戰鬥力與抗戰情緒

(三) 中國空軍的將來

(A) 技術的訓練問題

(B) 政治的訓練問題

第六章 中國空軍的戰績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我國空軍的發展也與陸軍似的，雖然西方的精神輸入甚早，但是牠給與軍事上的改進，較之他國却是很爲遲緩。從歷史上加以追溯，在民國前六十五年中國便從西洋較入了航空機的模型及其圖說，閉關的中國從這時起才算有了航空的觀念。繼後雖有日俄戰役時兩國編成的氣球隊給予清廷的刺激，民國前三年雖有法國飛機師在京的演習，以及留日英兩國學生的自製飛機的試飛，（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種玩藝兒。）直至辛亥革命時，中國還是一部飛機也沒有。反而被革命軍方面用奧國飛機兩架來攻畧北京。

民國改元以後，對於空軍的設置較之滿清時代當然有了進步。但是因爲南北擾攘，干戈未息，所有飛機的配置，全是爲了內戰而使用；每一個軍閥購置飛機和訓練駕駛人員的計劃和目的，全是以私人的需要與財力爲轉移，說不上是整個國家的計劃。當日在北洋軍

國內興時，奉軍漸知空軍效力的偉大，因此不惜鉅資購飛機，創機廠，辦學校，大有雄飛宇內顧盼無人之概；而國內的直魯二系軍閥也漫無目的的從事鋪張，而成績較之奉軍却差得很遠。可是這些在奉，直，魯二系軍閥下所配置的飛機，並不會在對外戰爭上顯出甚麼威風；反之，在內戰時倒還能畧盡轟炸的能事。

繼後因北伐勝利而統一了南北，在航空救國方面曾作出了一種發展的計劃。不過爲了統一的不能澈底的做到，各省地方當局的擁兵自雄，又各自購買飛機以作封建軍閥的迷夢。九一八以及一二八的教訓使全國上下都銳意於軍備的改革，特別是空軍，在蔣委員長長策劃之下，已經具了近代化的規模。因之爲了空軍方面數年來的銳意建設，在民國二十六年的八一三抗戰之後，始能同近代化了的陸軍似的，同樣作出了使歐美人咋舌的成績。

在全面抗戰以前，日本並未如何想到中國的空軍會給牠的空襲以激劇的還擊；因爲中國的飛機數量遠不如日本，而在戰鬥經驗上，並不會有過若干次實地的經驗。但是空戰的結果，素稱精銳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隊，幾全被我英勇的空軍殲滅了。統計我空軍自奮勇應戰以來，八九月份擊落敵機六十餘架，擊毀敵艦達十餘艘；如果加上近數月來的成績，當

然更有可觀。

(二) 飛將軍的戰鬥力與抗戰情緒

關於中國空軍的實況，因為是涉到了國防計劃，在這裏不便細述。但是，在這立體戰爭的今日，國際間對於我國空軍的數目以及作戰能力，較之我們中國人也許還更注意而明瞭。因之，介紹外國軍事家的觀察批評，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寇蒂斯賴德航空公司代表華倫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遠東返國，曾在傑西城發表談話，認為『日本軍用飛機能多於中國，然而中國空軍人員的技術，高出於日本遠甚』。在中國空軍發展中曾有過許多協助的美國人，她的軍火商代表的論斷，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記得在二十六年九月八日的夜襲，其戰鬥技術會引起某外籍軍事專家的頌讚。該次夜襲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發生以來的第十一次，據觀戰的該外籍軍事專家追述中國空軍襲擊敵方的情況說：『余係研究空軍戰術者，故處此危險時期，仍不時參觀中日空軍戰術，綜觀

歷次中日空軍搏鬥，中國空軍戰士，其技術較日方確高超數倍。蓋華軍在精神上異常的振奮，而技術更純熟也。際今晨一時華軍轟擊日艦時，日艦以處此天未明曉前，甚感恐慌，於是紛紛移動，有不知所措之感。迨中國空軍投彈之際，日方必以探海燈，照明彈，高射砲，追擊砲一齊向天空亂放亂射，蓋既不知飛機有多少架，又未悉高度如何也。祇得無的放矢。而際斯時會，飛機忽又不見，迨砲聲稍稀，則有兔起突落，突又投彈，使日艦一無所獲，無法應付。如是者數十回合，始安然離去。今晨零時十七分，九日晚六時四十一分等三次，均因地因時，隨機變化，其戰鬥力實駕歐美法國空軍之上……由這位外國軍事專家口中的描寫，我空軍將士之偉蹟宛如活躍紙上。

在空軍的對外處女戰中，初試便奠定了光榮的基石，不僅是外國觀察者爲之吐舌；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並不會應度到所謂「支那人」能有如此純熟的技術。可是，我們在認識了上述的技術原因之外，對於那種使空軍人員奮勇殲敵的思想上底因素，尤應值得意味的。

一般訓練航空人員的方法，主要的是在恐怖心理的克服。因爲關於生理方面的活動，如體力的運動，以及對養氣飢餓的能耐與否，溫度變化是否具有相當的抵抗力等，都是任

何國家訓練空軍技術必具的共同條件；然而惟有克服恐怖心理的訓練，却不能一概而論的。即以中國此次的抗戰而論，空軍人員的技術竟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料以外，並非一些空軍人員全是神乎其神人物；而他們所以能戰勝日本空軍人員的原因，純然是他們在心理上超起了任何戰鬥人員的強堅意志。因為日本的空軍人員之出動，純然是爲了懼于強力的壓迫，勉強他們去作侵略的戰爭，其戰鬥的意識自然是不十分強烈。而我們這次的抗戰，却是爲了獨立生存，爲了捍衛疆土，爲了正義與和平，有此神聖的抗戰意識，再發而爲神聖的抗戰自然是容易獲得勝算的。所以我們的空軍戰士是勇猛向前，奮不顧身的去殲敵；他們沒有神的護佑，祖國的生存便是他們共同的神。返觀我們的敵國，爲了怯懦的被壓迫者之缺乏戰鬥情緒，每個人身上都帶着神符和千人針，企圖以迷信來減低戰鬥員恐怖的心理；這種行爲是可憐而又可笑，無怪乎他們在凌空戰鬥時的倉皇應戰和乘機逃逸了。

在今日，中國藉着全國強烈的抗戰意識構成了整個肉的長城；而在實際上，是由平面而成了立體。一片肉和一滴血，都要爲了獨立解放的戰爭，而從陸地迤邐延展到天堂。像轟炸上海日本海軍司令部以致自槍身殉的閩海文，雖是敵方。而對於他壯烈的最後，也不

能深表敬意而給以厚葬；甚至發出了「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的驚嘆。中國空軍將士們做到這種地步，正像陸軍所表現的成績似的，壯烈英勇的表現，都是日本的侵略所致。過去雖然人們是不願冒險去當兵，但在抗戰後的今日，正有無數的戰士，期待着把他們訓練成爲凌空殺敵的飛將軍呢。

(三) 中國空軍的將來

(a) 技術的訓練問題

中國空軍的威力，在過去數月的抗戰中已經給予了敵人不少的威脅；空軍第一次的對外處女戰能有這樣驚人的成績，我們是應得爲空軍前途慶祝的。

不過，中國空軍的發展也只是近幾年來的事；尤其是在產業落後的我們，關於飛機的原料，除了少數的附件外，都是非仰給于歐美各國不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像法、蘇、美等國似的，平常保持三五千架的實力，要具備着數千戰鬥員，並不是短期內可以辦到。然而爲了中國幅員的遼闊，海岸綫的悠長，又非有強大的空軍不足以保護領土的

完備和安全。因之，在敵人以大量飛機四出肆虐，以轟炸不設防城市與無辜平民之際，我們要保障人民的安全，要企圖從持久的抗戰中獲得最后的勝利，非迅速的建立強大空軍不可。

可是，一提到建立強大的空軍時，在生產落後的中國，急待要解決的問題，較之其他各強國是複雜得多。如飛機的供給問題，如果純然是仰賴於國際的輸入，一旦被敵人封鎖，運輸發生阻礙時，就是有充分的經濟力量也是難於購辦的。所以飛機的自製問題是目前急應解決的問題；只要意味到敵人封鎖海口後關於軍火運輸所發生的不便，上述問題的嚴重性是不可否認的。次如技術的訓練也有加強的必要，而且是飛機自製問題解決前後都是同等重要的。飛機是機械的，儘管能自給自給，儘管有足以防衛國土的數量，如果缺乏熟練的技術，即有大量良好的飛機也是徒具形式的。在過去，因為中國空軍歷史的短促，駕駛技術之不曾臻到最高度，乃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今後我們應接受西班牙內戰中所給予的教訓，努力去使用或學習法蘇德等國的技術；尤其蘇俄近年來在飛機製造與駕駛方面的長足進展，超越了他往昔飛機器械供應者的美國。據目前形勢的轉移，我們技術差次的戰鬥

員已經在接受蘇俄顧問的訓練，學習他們駕駛的技術，使用他們特別裝具的飛機。中國空軍前途的無量，我們是可以預期的。

(b) 政治的訓練問題

在技術的訓練之外，我認爲特別提出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訓練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在過去的訓練中曾有一種相當的實施；但是；在全面抗戰後陸軍尙且感覺政治訓練缺乏的現在，提出空軍政治訓練的加強，而是具有特殊意義的。

中國空軍的素質，因爲甄選的比較嚴格，較之陸軍自然是高超得多。可是嚴格的說來，由於國民素質的傳統影響，從空軍將士們所表現出的事實來分析，一些陸軍所具有的不良習慣，在空軍中大都是存在着。這些惡習慣以及傳統思想的存留，只要稍一留意空軍將士生活和行動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據協助中國建設空軍並教練中央航空學校飛行員的美國空軍中校邱特 (Jonest)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份的亞細亞雜誌的回憶文中說，他第一次甄別航校的飛行員，在二百人中便有一百五十欠缺才能和敏捷，因未達到航校所定標準而受淘汰。而每年請求入學的一萬青年，也只能錄取四百名。——然而另一方面

人却認爲空軍將士們的危險既較之其他兵種爲大，而在陸地上的精神與物質方面不合理的享受，自是不用厚非的。有了此種意見的存在，因之，空軍將士們即使在生活上有了足以妨害健康的行動，而人們都常是予以原諒的。從而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腐化了他們的思想；人們因牠的隱而不見，便因忽視而構成了傷害的原諒。可是，在貧弱中國的空軍之將來，在全圖強調政治的訓練時，此種直接足以妨礙健康，間接足以削弱戰鬥力的不合理生活，亟應加以克服的。

從抗戰五六月後的事實表現，不僅我們空軍將士的技術足以戰勝日本，而尤能戰勝日本的；乃是強烈的抗戰意識。不過敵人侵畧是貪得無厭的，他們思想上的侵襲也是無孔不入的；在持久抗戰中，由于預料到的自國底失利，難免不成爲敵人宣傳的好資料；如果缺乏持久的強烈的抗戰意識，恐不免發生心理上的動搖，增加對敵方恐怖的心理。因此，在上述的中國空軍人員的抗敵情緒方面，我們以後在作技術的訓練時，對於政治訓練的增補，是應予以並重和強調的。這樣，我們不僅在地上有肉的長城，而在天空也有肉的「鐵鳥之障」呢。

最後，我們對於這位在中國空軍建設上盡了不少力的客籍的認定，是不得不予以深切的體認，從這種體認中啓迪出爭自由與捍衛祖國的新途徑，才是我們所期冀的。他對於我們今日視作飛行員訓練場所的中央航空學校內的學生，曾在「亞細亞雜誌」的回憶說：「航校的中國飛行員是青年的先驅者。他們離開了甜蜜的家庭，慈愛的父母與和睦的朋友，爲的是一定要把整個的生命獻給國家。他們堅決的宣誓盡忠於他的國家和領袖；因此，爲了這種效忠的宣誓，在日本恫嚇北方聲中，很有助於全中國忠勇的士氣。——而且這個學校的本作用勝過了學校的本身，牠已變成了統一中國的最重要的工具；在兩廣事變時，各省相率以道德和經濟扶助中央政府，實現中國的統一，這使日本和其他列強大吃一驚。」有了此種思想的訓練和國家意識的昂揚，故能在八一三全面抗戰之初，因爲空軍的效忠國家，給予日本的「還擊」，給予日本的驕傲以重大的打擊。爲了中國擁有此等空軍，正像邱特氏所認定似的：「日本軍隊可以在上海附近登陸，日本的飛機可以得到根據地，但是日本飛機無力制止中國的抗戰。」在持久抗戰中，儘有無數的閩海文，等待着接受西方的訓練，準備爲保衛祖國而犧牲，準備與空中的侵略者拚個你死我活。

第七章 中國軍人的改造及其將來

- (一) 外患與軍備的改進
- (二) 外人眼中的現代中國軍人
- (三) 抗戰中的遊擊戰術
- (四) 全面抗戰中的兵士與統帶
- (五) 志願兵與徵兵問題
- (六) 全面抗戰後中國兵士之將來
 - (a) 抗戰後的中國兵士與民衆
 - (b) 外人論抗戰受挫的原因
 - (c) 中國兵士的將來

第七章 中國軍人的改造及其將來

(一) 外患與軍備的改進

中國的軍備如果沒有外侮的侵陵，也許到今日還是比用弓矢的時代進步不了好多；正像外人認為日本的侵畧是促進中國統一似的，我們今日也不得不在親視了少數的機械化隊伍之後，感謝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在中國開始以西法訓練軍隊之初，替清廷平亂的常勝軍將領戈登將軍，(General Gordon) 曾在上會國藩書中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砲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然而守舊的曾國藩不肯倡率此議，并置戈登的建議於不顧，把這位忠心耿耿的客卿底推心話淡然置之，甘願逗留於舊有軍事技術水準下。幸好有遠見的李鴻章起而創立新軍，故爾在中日戰爭爆發之際，才有少數進步的陸軍可資對壘。依歷史的程序說，中國遭受了鴉片戰爭的慘敗後，理應在軍備上有較大的改進，然而到太平軍崛起的時候，清廷的兵卒仍然是使用

物予弓矢以平亂；這都是貴族中守舊的份子在那裏作祟，極力阻撓建立新軍的計劃。以至劉兆祥新軍甫行建立的時候，假藉神道夢想用刀矛符咒以對抗新式兵器者的反動份子，還替中國留下了莫大的恥辱。以後雖有新軍的建立，但是也僅賴其表，實質上還是與旗幟綠營的腐敗，沒有軒輊。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北洋軍閥崩潰之前，其意敗腐化的情形，還只有一天一天的加劇，沒有澄清和改革的可能。

如果從表面上來看，在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軍備似乎已經有了空前的改進，但是在兵的素質上，精神訓練上，裝具上，較之各先進國真是瞠乎其後；宜乎在九一八事變之際，以數十萬之衆尚不能保全三省土地於一夜。可是，如果沒有九一八這一種鉅大的刺激，中國的軍備一定還是逗留於九一八以前的技術水準下，而沒有編配若干國防軍而使之現代化的企圖。試觀熱河失守前守軍的裝配，便可知東北的失陷以及華北各省的相繼感受日本的威脅，是有其主觀的原因在。

記得熱河在失守前，宋子文曾在公開的談話中認為熱河可以守一星期至十日。當日聽他說話的人都以為未免太滅殺了自己的威風；因為大家認為即使日軍長驅直入，一無阻礙

繼續數星期的步行，才能從熱河邊境到達承德，承德僅可守十日話未免滑稽。但日方行軍是不可以步行計其途程的，我們的軍事人員歷來便充滿舊式戰術的觀念，而昧於近代戰術的認識，以為還是像中國軍似的，以數萬或數十萬舊式大軍，施行迂迴似的日行數十里，以騾車及駱駝交通工具，而對於以數月不斷的後方集中準動而作最後數日決戰的近代戰爭全不會領會到。當時我們守熱河的部隊，參謀工作毫無，長官逍遙他方，用騾駝拖曳太古式的車輛，以作軍事運輸，高射砲及掘壕工具絲毫未備，兵士只有操場式之訓練，而缺乏思想的訓練。如此，而使士兵以血肉之軀與飛機大砲坦克車作一句的死戰，然而熱河也終至失陷於敵人之手。可是，這一場慘痛的教訓，正如西語所昭示似的：「吾等非必求勝而戰，縱而敗，可於敗中求得光榮途徑。」以及在南北所發生的長城抗戰，與淞滬抵抗及綏遠抗戰，都是使人從每一次的慘痛中獲得了走向光榮的途徑。因為幾次劇烈的慘痛中都給與中國人以重大的教訓，誘發起重大的覺悟；失地和敗潰的責任並不是在一人，也不是在某一部份負責者，而是應歸咎於我國的軍制，國家年費好幾千萬養兵，而數百萬器械窳敗，衣食不周，訓練缺乏，素質不良的士兵，縱是見危授命，也等於是驅市人而戰，幾等烏

合；以與素質良好，器械優良，訓練有方的敵方作戰，未有不趨於敗績的。只有拋棄十八世紀的戰術方式，努力於現代化軍隊的訓練，才可以「從失敗中求得勝利」。

西語所謂的「從失敗中求得光明的途徑」，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六年間，經過若干次激烈的迫壓，忍受過若干次難言的恥辱，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件以及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的前夜，才有少數現代化（機械化）的軍隊足以遂行「予打擊者以打擊」。的戰爭。若沒有外患的憑陵，若沒有東洋劊子手的舉刀相向，所謂東方睡獅還會沉迷不醒的。

在這裏恕我不能舉出機密的國防計劃來作參證，然而在全面抗戰後的數月間，我們並不是全以血肉之軀去抗禦敵人的飛機坦克大砲，較之以往的軍備，在事實上確有了大量的進步。在這裏不便多說，姑介紹日本軍人方面對我國軍人的作價以資說明，較之我們自己的估價也許更為確切。

日本陸軍省新聞步兵中校雨宮巽在雄辯雜誌（一九三七年八月號）中曾論到中國的軍備，他認為現在中國招募新兵，絕非昔日的不良姿態可比。今日中國的新兵素質，充滿着國防意識及國家觀念。他們為捍衛祖國而從戎，從戎後即有完成這使命的企圖。更是因為

軍事學校的衆多，受過圓滿的正規教育的將校，使一些腐化的將校趨于淘汰。這些精銳的幹部編入軍隊以後，使軍隊的素質蒸蒸日上。同時，那些不調整的軍隊也逐年減少，逐年加以整理，總兵力已由三百萬減爲二百萬；一方面因受優良薰染的結果，執有優良兵器的新軍隊倒逐年而增加。過去中國軍人簡直不知空軍爲何事，現在中國軍用飛機的數量增加及操縱技術的進步，常使歐美人驚感其進展之速，尤使日本的國防感着莫大的威脅。他的結論更說現在的中國軍備無論在形式或精神方面，都表現了長足的進步；雖然軍事顧問與教育有聘自德意兩國的，雖然軍需品泰半購自歐美列強，可是以短促數年，其軍事教育已獲得美滿的效果，誠爲意想不到的事。

日本軍人對中國軍備的作價，本有不少紛歧的議論；過去多是惡意的批評，但自從西安事變以前所發生「對華再認識」議論興起後，他們對中國軍備的作價也是刮目相看，把往日鄙視的眼光改換成了驚異的眼光。在這其中，他們却忽視了一點：「日本的侵略促成中國的統一和抗戰！」我們在自覺軍備的進步之餘，除了對各帝國主義者侵略衷心給與感謝之外，而對日本的加緊侵略，使我們用「血」奠定復興的基礎，尤應致其感謝之忱！

(二) 外人眼中的現代中國軍人

素爲外國人所藐視的中國兵士，過去曾因一二八的淞滬抗戰而使他們改變了視聽。在那一次獅子吼後，曾發生過長城抗戰與綏遠抗戰，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又在淞滬開始了更宏壯響亮的咆哮；尤其是，這一次「予打擊者以打擊」的英勇抗戰，頓使外人學中國已由弱者步入了「列強之林」，（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語。）我們雖覺受之有愧，但至少是使外人稍稍窺見了中國人因民族自衛而表現出的戰鬥性。

從英國的各種出版物中，可以看出不少稱贊中國兵士勇敢而機敏的文字。在滬戰開始的一月間，上海英國人辦的泰晤士報以及字林西報都會有驚佩的語句。泰晤士報認爲：「中國能在開戰最初的兩週間迅速築成堅固的半永久性之障地，足見中國抵禦之決心堅如磐石。在進攻的武器與機械化力量方面，日本方面誠有足多；但此種實力所遭遇之抵抗，則必遠在一二八時十九路軍著名戰鬥之上。于此尚有一極重之因素，即華軍士氣之盛無可比喻，且隨戰鬥行動之發展，其鬥志必將益愈堅強。字林西報認爲：日本對中國無止的侵界，

已使中國之抵抗更爲堅決。中國的軍民，自最高將領以至於士兵民衆，刻正堅決一致，共同赴敵。因此在倫敦方面對中國的抗戰大表同情，對中國士兵的奮勇抗戰，也是表示極度的崇敬。更是，他們不僅發覺了中國兵士的抗戰精神，而且以歐洲大戰時的名機槍手「查利」來譽抗戰的中國士兵，以三個銅盔抵禦數百日軍的進攻爲中國兵士特有的機警和勇敢。這一些都是有事實的根據，而不是信口的過譽。

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會從歷史上敘述中國軍隊的嬗變，結論贊譽着新軍爲思想而戰，爲衛國而戰的精神。牠認爲「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開始產生，民族主義給中國人民以一個新的目標，使一般軍人爲思想而戰。所有過去一切改進的力量，一個跟着一個增加他的動力，因以產生今日中國之新軍隊。此種軍隊不是爲求得個人之財富，乃是在嚴格的訓練與組織之下，領取餉食糧與適當的待遇。他們已不復爲軍閥個人所私有，而是具有屬於國家之意識，一種可以驕傲的意識，即是成爲一個真正衛國之戰士以抵抗其侵略之敵人。不管今年（一九三七）這次戰爭是勝利還是失敗，在中國一定要有一個更大的根本的轉變發生，中國已經有了國家軍隊了。」
「辜遜氏在該刊上根據研究中國士兵戰鬥力有年的美

國某軍事專家的意見說：只要有所爲而戰，無疑地中國的士兵是極堅毅而勇敢的能刻苦耐勞的；中國軍隊在有把握抵抗外侮的時候，它是勇往直前的。享遜氏的話更是透關之論。

巴黎旁觀報的軍事評論家加特列瑪曾對中國的陸軍給以最高的評價，認爲在最近十年來的努力，因新兵器的配置而改裝了的部隊之作戰訓練，也佔着極高的水準。曾在一九三三年和馬萊爵士因反戰運動而到過上海的法國作家古久列氏在八一三的上海抗戰剛開始時曾在人道報著論到中日戰爭，他認爲日本對於中國萬惡的侵略遇到了東京萬想不到抵抗。在軍民一致的抗戰中，中國是能夠攔住那遠東大戰的煽動者的。此話在南京失守後雖覺有修正的必要，但中國並不會屈膝，日本二十四小時征服中國的狂言是被推翻了。

不只是歐美各國的觀察家是如此的論斷，就是被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御用的文人木村毅，他在從此次的「上海砲火中的散步」歸去後，曾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號的日本評論中盛稱中國軍的尊嚴說：「中國軍隊這一次打得很好，很堅強有力。日本軍事當局也絕不敢再藐視中國軍隊。在上海，現在誰也不敢再用「清國老」這種侮辱的話，大家都通用着「中國先生」這種含有尊敬意思的話。不錯，我們今日是用鮮血洗滌了幾十年的「清國老」

恥辱，不僅是一般人把「中國先生」當作敬語用，即是所謂常勝的「皇軍」，也在戰敗時跪下持鎗叫着「中國先生」以求饒命呢。今日的中國是不再「屈膝」求饒了，爲要維持她的獨立，將要拚力戰鬥至後一滴血爲止。

(二) 抗戰中的游擊戰術

外族對予中國的侵畧，常是使用着「以中國攻中國」的方法；如蒙古之征服宋朝，滿清之征服明朝，以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都是在利用中國人以製造內戰。可是，在全面抗戰後的今日，對於日本的挑撥內戰，却不能不予以感謝之忱；原因便是我們軍人作戰的技術和戰術都有長足的進步。（西洋人也有這種認定。）

我們今日能具有給「打擊者以打擊」的力量，以及能在華北展開游擊戰的戰術，都是與歷年的所謂內戰有關係的。因爲日本在中國多年的內戰中，日本挑撥的目的只達到一半；即是使中國的力量消耗於內戰中，沒有力量來對付日本。但是在內戰的過程中，我們多年來鍛鍊出了千千萬萬拿武器的兵士，在敵人侵陵時所發生的幾次抗戰中，他們把槍口一轉

，就把千千万萬的子彈打在侵略者的頭上；尤其是今日八路軍所使用的游擊戰術，也許是我們在內戰中所獲得的偉大的收穫罷？

游擊戰術在今日被認為被壓迫民族抗戰的唯一戰術。中國有名的古軍事學家孫武所謂的「以奇制勝」便是游擊戰的意思。他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後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以後由奇兵演而為游兵，其意義更與游擊戰相同。因為游兵的意思是兵無定在，其條件必士銳而捷騎，將勇而識優，時東時西，時出時入。敵怒而迎，我引而退；敵倦而息，我臨而擾，擊其懈弛，擊其倉猝，禁其積聚，襲其要害，取其別營，絕其便道；或左或右，或朝或暮，或左或右，或前或後，伺敵之隙，乘間受利，飄忽迅速，莫可蹤跡，使敵腹背均害，進退維谷。在這種條件之下，楚漢相爭時，彭越用游兵以取楚方臨陽以北數十城；晉安帝時，劉道規以游軍破徐道覆三萬大軍，都是歷史上的好例。他如農民暴動中所採用的戰術。

。素來都誣罵爲「流寇戰術」。如漢朝天鳳年間的赤眉與綠林之亂，後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唐朝的黃巢之亂，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張獻忠之亂，以及滿清中葉的太平軍之亂，他們的此伏彼出，聲東擊西，忽而化整爲零，忽而化零爲整，使追剿的官兵疲於奔命，卽可以說，是游擊戰的運用。

爲了游擊戰被認爲流寇戰術的關係，牠過去在軍事上是很少有運用的。牠之正式成爲軍事上的用語，可說是全面抗戰以後的事。在西文中的 (Partisan) 可譯爲突擊隊，挺進隊。在蘇俄的發展過程中，曾用牠克服了不少外來的壓迫。蘇俄小百科辭典一書中對 (Partisan) 這個字的解釋爲：「以隔絕阻礙敵人之一部，或破壞敵人與其根據地的交通和聯絡爲目的，從其側翼或後方給以襲擊之輕快的獨立支隊。」八路軍前身的紅軍，他們抵抗中央大軍的圍剿，其戰術便是由蘇俄學習得來的。這種戰術使中央軍經過六七年的五次圍剿，才逼迫他們突出江西，而作出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關於這，美國作家史德華 (Mr. S. Stewart) 氏認爲近年最善用最用游擊戰術的，恐怕要算是中國的「紅軍」，因爲他們以少數未經訓練而器械窳敗的軍隊，還能在中國大部的省份中進行着「捉迷藏式」的游擊戰術；

如果不善於運用游擊戰術，而專靠人力與器械，恐怕早已消滅了。果然，在八路軍開到青北後，因為游擊戰術的展開，屢次予侵略者以慘痛的打擊。

在他方面，東三省，和華北的義勇軍游擊隊乃至別動隊等，他們正運用着游擊以抵抗急進的侵略者。東北失陷的數年中，由農民們組成的義勇軍屢次突擊日本的軍隊，折斷鐵路，破壞橋樑，以及用其他各種方法來截斷交通。最近在南北戰場担任游擊戰的部隊，也同樣的給予敵人以威脅；有不少失地是由游擊隊收復的。將來各戰區擴展，游擊的區域也必然隨之加增，而我們持久抗戰的條件，可以藉游擊戰術來完成。

英國曼切斯特保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曾說：『無論中國軍事當局的作戰計劃如何，它會馬上用大批獨立隊伍轉取遊擊行動，在因地制宜以打擊侵略者。無論如何，遊擊戰術對於中國是最好的戰術，與日本陸軍正面衝突，中國人只有因日本空軍和砲兵的優越而受損失。……』史德華也認為：『在主力戰中，華軍之敗是勢所必然。雖然中央有若干師人是可以與日軍角逐疆場，且能取勝；但是用戰車和空軍去與日本的高度機械化部隊作無限度的堅持，是比較難於制勝的。反之，在北平西山採取遊擊戰術的幾千兵士和在

衝突初期竄入天津的便衣隊，他們給與日軍的煩惱，比保定城的主力軍所給與的更多；上海被日軍佔去的地盤內，日軍掠取的行動也很嚴峻地爲便衣隊及射手所苦。要之，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日軍愈將戰線延長，是愈容易爲遊擊隊所創的。自然我們不能以一時戰事上的挫敗作飾詞，我們致敗的原因是有多年來積累下的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在。不過，侵略者佔領的只是鐵路綫和公路綫，企圖使用犀利的交通工具，以作取勝的武器；殊不知，侵略者的勢力伸入越深，而他的危險性便越大。我們在過去是曾在若干次內戰中廝併過多次，忍受過一切痛苦；今日爲了全民族的獨立戰爭，我們靠着浩盛的士氣，以及人力，地理的條件很可維持遊擊戰術以期待日本政治及經濟底崩潰，從萬衆一心支持着的持久的焦土抗戰中獲得勝利。

（四）全面抗戰中的兵士與統帶

在過去的幾次局部抗戰，以及此次的全面抗戰中，由中國兵士所作出的英勇成績，使人們對兵士修正了過去蔑視的心理。尤其是在此次全面抗戰中，素被人譏爲「軍閥走下狗

以及「烏合之衆」的中國兵士，他們的抗戰情緒正像在局部抗戰中似的，全是出乎意料以外的昂揚。

由這種悲壯的英勇的事實，無形間廓清了若干年來兵士們積壓下的恥辱，而將兵的素質增進了不少；而國民對之，亟應予以精神上的支持。關於這點，孫夫人宋慶齡曾在英文亞細亞雜誌中認為：我們必須養成軍人的精神，並當以各種努力改變人民對待為國家民族而戰鬥的兵士的態度。因為當中國苦於內戰時，人民對待兵士的態度自然無法積極；但是內戰過去了，用兵的目的是在保衛國家獨立時，人民對待兵士的態度自然也當改變的。不錯的，我們應該對兵士刮目相看，給他們以精神上的監督和支持，以便他們能逐漸成爲現代中國獨立戰爭中最偉大的戰士。

至于中國兵士們的犧牲精神，素來是被認爲壯烈的。如果從歷史上來加以檢討：春秋戰國時的地盤爭奪戰；太平軍與滿清軍隊十餘年的城市爭奪戰；民國以來全國各地的混戰；在在都是表現出兵卒們犧牲的精神。中國兵卒們之能有如此偉大的犧牲精神，曾經引起西洋觀察家的懷疑，他們看到中國兵士素質的腐敗，思想訓練的缺乏，器械的盜敗；總懷

疑是缺乏戰鬥性的，然而事實上却恰恰相反，而由他們底血肉鑄成了不少偉烈的事蹟。這正如中國的玄學似的，同樣是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

因為過去中國的兵士，不十分注意于素質的選擇，而只是注重在「重賞罰」與將材的考量。最好的例子是那個帶領中國軍隊，幫助滿清政府撲滅太平軍叛亂的英國或登將軍所論斷的事實：「中國兵士如果有一個好的隊長率領，是可以成爲優良的戰士。」這即是說，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只要有一個善于「將兵」的人，就是劣等的部隊，也可以因將帥的得人，而使之成爲戰陣上的勁旅。像過去所有的若干次對侵略者的抗戰，大半應歸咎於將領的差誤和不抵抗，而兵士的憤慨與敵愾心是強烈地被壓抑著。如李陵征匈奴的敗績，是由於寡不敵衆，而兵卒們尙能在敵數十萬合圍之下，因陵的振臂一呼，劍霜皆起，舉刃向虜。南宋的士氣固屢次的敗績與夫主和者的牽制，本是頹廢已極，然而有了智勇的岳飛出而統率，就是新收編的烏合匪衆，也能成爲敵人不可撼搖的「岳家軍」底鬥士。中法戰爭時，中國兵士的棄戈而逃，錯不在勇敢的兵，而錯在管軍需者的稽遲；沒有槍彈的開槍是徒勞無功的。在今日，據說張發奎將軍所指揮的部隊，平常並不是勁旅，在小小的浦東

却能支持二月以上，使敵人不能選登陸詭計。（以後浦東的退出並不是在張發奎防守時，他當時早已改換了防禦綫，浦東改由某部担任防守後而致失陷。）又如常被入譏爲「內戰英雄軍」的四川軍隊，在全面抗戰時由南北戰場上所表現的事實，也使人不得不改易着舊有的觀念。據說楊森將軍所統率的二十軍，一接到出發的命令，竟不辭跋涉的徒步開拔，頓改了內戰時頑橫驕縱的心理而代替了抗敵的情緒；到達上海前線後，而能在最激烈的火線上作抗敵的壯烈犧牲。返觀其一些素來養尊處優的部隊，由於統帶的無能與畏縮；在平漢綫上構成了數百里的敗績；在津浦線上遲遲不進，弄得敵人節節得勝。這一切即可證明，無論是何種素質的兵都可作有意義的戰爭，而急需的是能幹，有胆識，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將材。因爲中國兵士偉大的地方在能「爲戰爭而戰爭」，只要將兵者能把握着他們的特性，無有不能獲勝的。否則，在敵人加緊侵略的時期，決不容我好整以暇；若要期待着兵之素質的澈底改造，恐怕已經國將不國了。

（五）志願兵與徵兵問題

我國的兵徵本來起源甚早，古代的寓兵於農，可說即是徵兵的實事表現。可惜後來國爲統治者的爭殺，都想把兵卒佔爲私有，以便隨時遂行其掠奪爭殺的野心，因之傭兵制度的存在，雖有府兵等比較近於古代農兵的制度產生，他也只是一時代的偶現，不久仍然回復了傭兵的舊態。賢明的有政者雖也是力求矯正傭兵的陋弊，如滿清末年及民國初年的征兵制之提倡，可惜只是一時的倡導，而實際上缺乏使徵兵制趨於實現的客觀條件。即是到民國二十五年間，國府所頒佈的兵役法，如果沒有九一八以來諸般國難的刺激，使國家有銳意「整軍」「肅軍」的必要，在事實上也是難於由頒佈而臻於實施的。

關於徵兵制的實行，在全面抗戰開始後，因爲前方兵員的補充，在戰區及非戰區各省都會極積推行。可是，爲了民衆賤視兵卒，爲了對兵士用途的模糊，爲了對抗戰事件的缺乏明瞭和了解，以致在徵兵制推行中發生許多不良的現象。爲了「好人不當兵」的毒語仍然植根在民衆的腦中，他們之賤視兵士是有其傳統性的；因之，他們認爲在徵兵時所徵的「壯丁」，仍是與內戰時強拉民丁去爲私人利益作炮灰似的，無非是爲了升官發財，爭城奪地而犧牲。有了這種傳統的意識，自然對抗戰事件也是缺乏明瞭和了解；這樣，要他們

出力乃至犧牲頭顱來捍衛國家，要他們出錢來支持抗戰，事實上最難於達到目的。即使他們攝於威力而勉強去應戰，其戰鬥意識之是否足以支持抗戰，是十分值得懷疑的。甚至由於民衆對當兵的賤視，有身家或素質良好之輩，皆是在規避之餘，以金錢收買地方土約愚民或流氓以充數；由這種人組成的隊伍，較之烏合之衆，實在差不了好多。若是在持久抗戰中純靠他們來應戰，其挫敗是可以預測，用不着再與敵人久經訓練的兵員交綏。自然，我們並不是便爲了上述的潦結而全然失望，爲了要給以對症的藥，是不得不自己揭發現有的弱點；如果是諱言而加以掩飾，便是等於自掘墳墓。

我覺得要矯正上述的缺點，眼前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很迫切需要的。因此，改善政治上的待遇，如「切實」廢除苛捐雜稅，（人民負擔苛雜之不限，自然憎惡兵役），「切實」施行出征將士家庭生活之保障與優待，「切實」實行陣亡將士撫卹辦法，「切實」改良在營生活上之待遇，（會聞存營徵兵，四月未見分文餉銀，因爲餉項一發，恐怕她對辦小差。此等徒在形式組織下拘束之兵士，自然難于盡抗戰之能事。）受傷後之優待等，在在都是目前亟應從事。自然，在我們這貧困而政治又剛上軌道的國家，事事都不能立

難至；可是，人爲的一切阻礙，如果因政府與民衆的努力策進，並非是全不能克服的。在徵兵制之外，義勇軍或志願兵的募集，我認爲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目前的中國雖有徵兵與各種戰時服務機關的存在，但不屬於上述範圍以內，而有志服務的，勇於犧牲却大有人在。下面便以觀感所得畧抒己見以資獻替。

義勇軍在西洋各國是用以補常備軍的不足，其素質是相當的良好，而文化水準也比較爲高。中國歷代之所謂「民兵」，也常有由于此種意義而召集的；在清朝中葉之所謂「義勇」，如湘勇，淮勇之類，都是能補正規軍如旗兵與綠營等的不足。在九一八以後因爲駐段東三省及熱河等正規軍不抵抗而喪失了四省的錦繡山河，散失的兵士和不甘屈服的農民，便組成了義勇軍，他們的力量雖是單薄，但却能在陷落的省份內給敵人以軍事上的牽制；數年來若干次的攻取，使敵人不得不派重兵以資鎮懾。自從八一三的全戰開始後，担任游擊的部隊，可說大部份是由「義勇」的人們參加的；隨着戰區的擴展，需要「義勇」的人們來担任游擊的任務，其需要也是與日俱增的。因爲這些人大多是退伍軍人，保安團隊，他們早具有戰鬥經驗，只要在形式上加以調整，在政治意識加以增補，立即是可以作戰

的（自然內中也有不少智識份子，但他們也都以在豐富的政治常識之外，更具有軍事的常識。）所以，今日政府對於此種「義勇」份子之發動與組織，我認為是在徵兵以外必須兼進的工作，而且是具有特殊意義的。

義勇軍與志願兵是名異而質同的。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爲了保衛祖國而顯犧牲性命的人民，立刻因志願兵的事實而形成了「志願兵制」。克魯泡特金在他的名著「法國大革命史」內曾論到當日的志願兵，認爲：一七九三年的志願兵雖是窮得很可憐，雖常是饑餓亦足而飢餓，但是他們受了平等革命的感召，人們預料到會失敗的戰爭，志願兵總是打了勝仗。在全而抗戰持續到了六月的今日，距離國民全體動員的事實尚遠，自然更難說得上全民的武裝。因之，以志願兵補徵兵的不足，在素質上和戰鬥力上都是較之徵兵更爲優良。此刻我們不能像某部份人主張似的，企圖由志願兵制過渡到徵兵制；然而負有武裝民衆之責的人，在相當的權宜之後，如果把兩種制度相輔而行，至少可以做到全民武裝的。

在實行志願兵的募集時，也應得像兵役法似的，以「救亡」與「抗戰」爲中心意識而募集在兵役法以外人參加抗日戰爭；與其在不健全的政治機構下容許多量的知識份子或有

志報國而苦於無門的青年人逍遙沉迷和頹廢，遠不如以志願兵制去招致而運用起來，減少政府對社會治安的顧慮，而替抗戰陣線增加不少的力量。記得在法國大革命時，國民會議在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通過法令，認定法蘭西人應當全體起來擁護他們的自由和憲法，並將侵畧的敵人逐出境外，從法令公佈之日起，一切法蘭西人都應當準備隨時入軍隊中服務；不論男女老幼都有適宜的分類工作，決不能讓他在危亡的祖國內逃避。比如說，凡青年人當在戰場上作戰，有妻室的人製造軍器，輸送糧食，婦女則縫製營帳，軍服，並入醫院看護傷兵，小孩則剪裹紗布，老年人則在公共場所游行講演以鼓舞戰士的勇氣。據歷史告訴我們，這法令公布後，在法國大革命曾經做出了不少光榮的成績。

在今日的中國，也急應有較兵役法更進一步的戰時救亡法令，在這法令中不僅應使徵兵制與志願兵制相因相成以挽救祖國的危亡，而且由此法令的頒行，從而可以動員全中國的男女老幼。因為進攻的敵人正使全民動員的力量以謀我，而我們如果只動員部份的武裝力量去抗抵，局部的抗抵必敗於集體的進攻，乃是必然的事。

(六) 全面抗戰與中國兵士之將來

(a) 抗戰後的兵士與民衆

「日本這次大軍的進攻，並對無防城市殘酷的轟炸，不僅不能削弱中國的士氣，却反而促成了他們抗戰的決心，中華民族爲了危機的脅迫，像一個人樣地站了起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是美國作家史德華氏在「中國怎樣取得勝利」一文所認定的。不錯的，中國人民抗戰的決心都表現在英勇壯烈的士氣上，沒有民衆抗戰決心的支持，士氣早已在敵人大軍的迫脅中削弱了。

在今日，全國的民衆以最大的決心支持着盛壯的士氣。如果加以歷史的迴溯，過去中國人是受盡了所謂「衛國」軍人們的禍害，政治上的重文輕武，以及社會上深痼的「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來看，已足徵民衆對軍人的厭惡；因此，他們除了不得已時遭受着壓迫與剝削外，只要有機可乘，無有不尋仇報復的；如要獲得他們誠意的支持是萬難企望的。但是，在抗戰後民衆對兵士的態度全改變了，雖然兵也許還是過去憎惡的兵，

而稱呼已換了「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士兵」，「我們的民族英雄」；全國的男女老幼以財力與勞力來支持抗戰的兵士，這次表現的成績是中國歷史上值得特書的一頁。原因第一自然是兵的素質在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改進，（此次抗戰的兵士有不少是由徵兵徵來的）如一些國防部隊，除了技術的訓練外，已極積在從事於思想的訓練。第二是因兵士的英勇抗戰，超越了若干年來所期望臻躋的素質領域，使兵士素質的短變邁過了她固有的演進程序。同時，抗戰兵士之獲得全國民衆的支持是無疑義的。

不過，爲了他們由私人的部隊變而爲國家化部隊的時間太短——有些在抗戰後還是隸屬於私人的——行動上還不能完全擺脫軍閥時代所具有的惡習氣，在我們發覺之後，是要想法給以克服，或在以後的兵士訓練上加以注意的。

第一是抗戰的意識還不十分強烈。這是因爲中國的兵士過去只有刻板的操場訓練而缺乏思想的訓練；故在抗戰開始後由行動上所表現的，不免有僥事的趨勢。在過去，中國兵士是爲了他的象笏者而犧牲，同時也是爲了自己的升官發財慾而犧牲。到今日他們也還不免有具着此種思想的。因之，有些對待遇的不滿，對民衆的帶索，在戰場上自己用刀與槍

假做傷口等，隨陣的脫逃，在傷兵醫院中的擾騷，傷癒不歸隊等，都是在內戰時兵士們共同的現象。在敵人加緊侵略的時候，自然不能讓我們從容不迫的來從事抗戰意識的加強；可是，今日還可以盡可能的對出徵的兵士作抗敵意識的增補，使他們瞭然於抗戰的神聖和偉大；如果仍像內戰時期似的，只是命令他們去從事戰爭，他們的戰鬥力一定是不能盡量發揮的。而對於預備兵，補充兵，壯丁，更是應在抗戰意識方面給以充分的灌輸；如此，他們到了戰場，其戰鬥力定是可以盡量發揮的。

第二是軍人與民衆的不能一氣。本來抗敵戰爭應是軍民一致的工作，如果軍人單獨抗戰，在給養，運輸，情報，修築工事等方面都要感受到極大的困難，而民衆爲了求得救亡的勝利，必需共同担負起抗戰的責任。像此次上海三個月間的抗戰，軍隊每到一地不是威脅民衆逃空而不與之合作，便是覺得民衆也有漢奸的嫌疑，反而以有民衆爲軍事上的大障礙。這都是由於素來所謂民衆運動的失策，一到運用的時候，才感覺了民衆力量是不能運轉自如。但是今日在非戰區或臨近戰區的地方，亟應使民衆與軍隊聯合起來去應付當前的國難，使軍隊成爲民衆軍隊，而與民衆不是處於脫離或對立的狀態。而負有教育民衆，組

織之責的人，對民的練而更予以切實注意，這種精神國防的建設，其重要是不下於物質國防的；否則，民衆早成了敵人的順民，有漢奸傾向的人之增多，處處都足以牽制或甚至摧毀堅固的物質國防。

(b) 外人論抗戰受挫的原因

在這兩者之外，我們在抗戰中受挫的原因也應明瞭的。記得密勒氏評論報在論北戰場中國軍隊受挫時認爲是因（一）軍備較劣；（二）指揮不統一；（三）缺乏抗戰的組織。他的話不僅可以用作北戰場受挫的評論，就是東戰場也可以適用的。不過就全部戰爭來說，我以爲還應加上（四）參謀人員的缺乏；（五）兵士訓練之不足；（六）軍事行動的遲緩，該報認爲在這次抗戰中顯示出來的，各省軍隊的武裝，訓練和組織，比之中央軍都相差太遠。在上海膠着抗戰着的中央軍的效率，雖然幾可以與任河軍隊相比，但各戰線上的各省軍隊，叫他們去和軍械精良，組織嚴密，行動迅速的日軍對仗，即使奮勇殺敵也還是不免一敗。再加以指揮的不統一，抗戰情緒的不足，更易招致敗北的。這些都是不可諱言的缺點，而是當前正應努力以圖克服的。

在密勒氏評論報所論述的以外，我們還感覺參謀人員的缺乏，兵士訓練之不足，軍事行動的遲緩等。參謀人員的缺乏，即使最高統帥所決定的戰略足以制勝，然而在執行命令時却常至陷於不利的地步。中國兵士之說得上訓練，也只是近數年的事；而且接受相當國防訓練的部隊，數目也并不算多。以缺乏訓練的部隊，在敵人節節侵陵的今日，只憑着共同的抗戰情緒以臨敵，自然難於殲滅敵人長久訓練的機械化的部隊，而操絕對的勝算。不過，敵人不能讓我好整以暇，而現代機械化的部隊之建立即有雄厚的財力，也不是立可驟及；故爾，只有在鉄蹄踏進之際，動員全國民衆，以血肉的長城去捍衛祖國，從血戰中去換取生存，粉碎「唯武器論者」，以及長期準備者的主張。

不過，對我們抗戰受挫的原因，不論其有武器的或軍事範圍方面的，只要事實與時間上的容許，而是要力求克服的。尤其是指揮的不統一，還在軍人中殘留着內戰時統兵者爭功，矜驕，血氣之勇的習氣，以致破壞了全線的作戰，而予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有了指揮的不統一，再加上參謀人才的缺乏，軍事技術的落後，這種在戰略上失敗而軍事行動遲緩的部隊，想要制勝是很難的。

(c) 中國兵士的將來

看了上述各章所論及的一切，不免要發生「中國兵士之將來」的問題，現在抗戰正在持續中，將來一切的演變，在此時不能遽作斷定，但是，有關中國兵士之將來的諸問題，是不妨作一種普遍的論述。

本來，戰場是一所最實際的軍事學校，而戰場上一切敵我的動態又是最新穎的材料，軍人似乎除了從戰場上獲得理論與實際的知識外，別的都好像是附屬的。可是事實並不是如此的簡單，而使軍人足以盡量發揮戰鬥力的諸種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帝國主義者積極準備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今日，一切所謂世界的新戰術理論，如夫拉主義，杜黑主義，塞克特將軍的精兵主義等，都是爲了大屠殺而產生的新理論。夫拉主義主張只要有優勢的機械化部隊，便可以衝破任何鉄的陣線，而認大量空軍爲無用。杜黑主義是主張以優越空軍爲主，而不需要大量陸軍的；因爲在現代戰爭中，一個能決勝的攻擊，不但以破壞武力爲目的，並要以破壞敵人後方民族中心爲目的；飛機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障礙，任意攻擊地面武力或對方空軍，所以空軍是良好的攻擊武力。塞克特將軍是主

要精兵主義的，他在他的「軍人魂」(Gedankbiliges Soldaten)和「一個軍人的理想」兩書中，很強調着這種思想，並不如何注意思想的問題。這些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家，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強化軍備，企圖對內鎮攝或壓抑異趣的民衆，對外足以發揮其盛大的武力。但是，在弱小民族的我們，並不像帝國主義者對其「大衆的軍隊」懷着恐慌似的，常常感着無法控制和駕駛。我們正要由大衆組成的軍隊，與乎共同具有對外抵抗拒思想的戰士；因之，除了在所謂機械化或精兵主義之外，政治的教育是佔主要的成分。不然，只有精良的武器，而缺乏有敵愾同仇思想的人來施行機械化的作戰，其失敗也是可以預期的。

我們此次經過數月抗戰的結果，認為政治（精神）的教育還不足以同軍事訓練相配合，也即是說「唯武器論」者的思想，至少是由事實上給予了大大的打擊，而不得不有所修正。再經過南北戰場上的受挫，至少有某一些關心軍隊中政治教育之改造的人，是意識到了受挫的政治的原因。而在將來乃至最近實施的軍事教育方面，想來是可以克服的。

塞克特 (Seckt) 將軍會說：「殲滅敵人是戰爭目的，然而有許多路是可以走向這個目的。」又說：「每次作戰必須由一種簡括而清明的思想來支配。每個人和一切事物均當隸

屬於這種思想。「我們在抗戰中所賴以支持的是民族獨立生存的意識，亦即是支配着戰爭的簡括而清明的思想；凡是在抗戰中，每一個國民和一切事物均當隸屬於這種思想。由是，我們對於每個國民，應膠固着共通的民族意識，使其精神國防鞏固到足以抗拒外來的精神侵襲，更進而有力的支着民族的生存。如此，來自民間的兵員，其思想也是與全體國民膠粘着，這種大衆的軍隊，尤其是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中，非如此不足以爭取最勝利的。關於這點，不僅唯武器論者的塞克特是有相當的認識，即是在德國戰前專靠犀利武器企圖征服世界的名將魯屯道夫（Luderhof），他在「全體性戰爭」（Total Krieg）一書中，首先便認定了全體性戰爭的基礎是在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團結。他以為一國的國防力，是植根在牠的民族中；全體性戰爭中的國防力之大小是視其民族的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的是精神力，而能在為爭民族生存之全體性戰爭中支持日久的，也視其精神為轉移。他之所以發出此論，是鑒於德國在這方面所感受的失敗：戰爭時間愈延長，精神團結之動搖也愈甚。德國因為民族意識的強烈，精神團結素稱鞏固，然而尚且為了戰事受挫的關係引起精神的動搖，以視我撒沙梭的

民衆精神，莫不滄天淵之別。我們如果在抗戰小小受挫之際，不在民衆中注重精神國防的鞏固，不在軍隊教育中加上政治（思想）的訓練，其前途的慘淡，恐怕比之於德國更不堪言呢。

因此，在今後軍隊的政治（思想）教育中，亟應有急劇的改造。如純操場似的死板教練，如不顧士兵知識程度而只行注入式的教育，如對士兵思想訓練的忽畧，如官兵生活的懸殊，如兵與民衆的脫輻乃至對立的現象，都是應在今日軍隊教育的實施中亟須改造或矯正。否則，上述每一種缺點都足以挫敗抗戰的陣線，反加速了敵人亡我的客觀條件。

魯屯道夫認為軍隊背後應有精神團及精神鞏固之人民；他因為是唯武器的論者，雖反復論到精神團結與軍事的關係，却只及於民衆應如何支持軍隊，而并未曾提及軍隊本身應爲如何側重於精神的訓練。中國今日的抗戰是與侵略陣綫中人的理論不同，即是不論軍隊與民衆都應具有共通的抗戰意識，使其鞏固而爲民族力與國防力最強悍的因素。如果，只以抗戰責任付之軍隊，而軍隊也會債事，而與民衆的疏隔或更加深。即使中國的軍隊十足機械化，政治教育有了充分的改造，也是不能單獨肩荷此種重任的。因爲今日的戰爭既不

是「軍隊戰」而是「國民戰」，在戰爭全體性化之後，必須有政治（思想）上的全體性來配合才行。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今日應牢記：「不可因小挫而志餒。」多難足以興邦，如果四萬萬人都願以血肉來築成新的長城，在最高統帥「戰至一寸土，一卒，一滴血」的決誓之下，經過數千年苦鬥的中華民族，我相信是可以因萬衆一心而求得自由與解放的。

（完）

中國軍人偉大

楊昌溪 著

實價叁角伍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月初版



出版者 上海金湯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發行者 全國各大書局



50
 44-1-43



1943